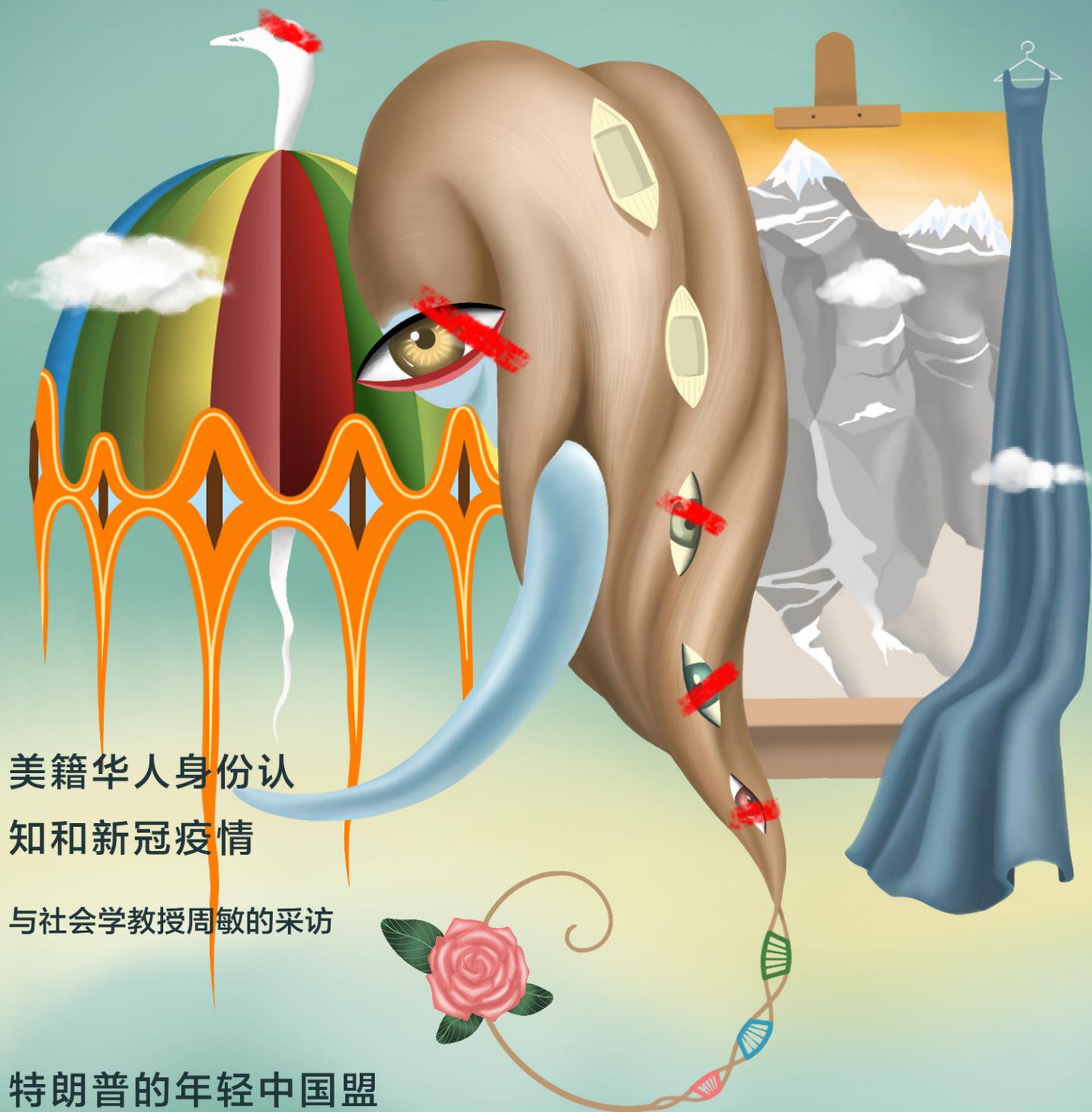


IUCJ



美籍华人身份认
知和新冠疫情

与社会学教授周敏的采访

特朗普的年轻中国盟
友及他们在社交媒体
上的反精英叙事

许军辉

认同与认知
认知与认同

《中美校际期刊》是一本双语的、半年度学术期刊。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的本科生提供一个发表他们具有跨学科思维、高学术水平研究成果的平台。作为UCBRC的附属组织，《中美校际期刊》的核心任务是联结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参与和促进“中美关系”相关话题讨论的同时，不断延伸与拓展对于全球性议题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本刊加强公众对于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事务的了解。刊物的内容包括讨论探究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我们将秉持相互比较、相互参照的思路，去讨论包括安全、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有关话题。IUCJ与诸多研究机构以及杰出的中美学者保持合作关系，并由此来秉持作为学术期刊的严谨性、高标准性。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etter Relations Coalition (UCBRC)，包括《中美校际期刊》，全部是由慷慨的个人捐助者以及在中美两国同时有业务运营的机构所资助。UCBRC和《中美校际期刊》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的资金支持。如果您对此政策还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outreach@iucj.org。



 中美校际期刊

IUCJ

第二期 | 2022年冬季

IUCJ 2022 编辑委员会

主编

罗星娜, 布朗大学 18级

李成, 布朗大学 18级

副主编

柯秋岚, 哈佛大学 17级

周慧玲, 中国传媒大学 17级

编辑

桂雪馨, 清华大学 19级

杭明理, 哈佛大学 17级

陈华中, 斯坦福大学 16级

王澄思,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级

傅师慧, 韦尔斯利学院 24级

吴唯莹,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23级

杨依云, 北京外国语大学 22级

视觉设计师

唐睿璟雅, 塔夫茨大学 17级

李悦濛, 塔夫茨大学 18级

目录

编者的来信 罗星娜和李成	1
特朗普的年轻中国盟友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反精英叙事 许军徽	2
信息焦虑后社会主义中国对信息的普遍幻象 吴唯莹	9
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中国跨国资本： 围绕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的叙事 郑铎	15
美籍华人身份认知和新冠疫情 周敏	25
红军：美国人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看法 刘果	28
中国借助区块链技术对抗COVID-19疫情是否能成功？ 黄巍, 赖华楷, 刘嘉玥, 徐诗淳, 吕思润	33

编者的来信

读者：

对交织在美中关系的许多人来说，过去两年尤其充满了挑战。两国之间的旅行受到严重限制，两个国家实施了体现有不同价值观和政府制度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由于线下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分歧被强调而不是共同点，美国和中国以越来越敌对的方式定义和看待彼此，这加剧了紧张局势，破坏了和解可能的希望。

IUCJ(中美联合校刊)由UCBRC创立，致力于围绕中美关系的消极叙述展开讨论并推向积极合作及相互理解的发展方向。为此，我们的第二刊将以不同学生对全球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看法为背景来考虑当今的中美关系。作为一本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共同完善发表的期刊，IUCJ将积极培育一股崭新的力量，来推崇相互帮助与理解的精神。我们的刊物将以双语的形式发布，更好的促进跨大洋的沟通交流。

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那些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并充分认识到团结一致、抵制两极分化以及停止无谓相互指责的重要性的人。国家如何定义自己和如何看待彼此会极大地影响它们的互动方式。因此，改善关系的第一步是确保乐观和善意的看法，并使其成为美中对话和互动的主流基调。

此致
敬礼

罗星娜和李成
主编
中美校际期刊



特朗普的年轻中国盟友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反精英叙事

许军徽
复旦大学 17级

摘要： 三分之二的美国千禧一代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职是美国民主所面临的一股危险逆流，然而他们在中国的不少同龄人却持有相反观点。这些特朗普的中国盟友对治愈美国社会弊病的精英处方深表怀疑；或者说，他们相信唐纳德·特朗普是能够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正确人选，尽管其时常对少数族裔和女性表现出不敬。本文旨在通过批判性内容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来调查特朗普年轻中国朋友们的政治观点。本文将展示实用主义的正统观念、通过代际联系和共同记忆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不平等观念、感知到的个人利益以及魅力型领导风格是如何解释反精英观念的源头的。

关键词： 中美关系能源贸易；中美关系；脱钩；互联互通；中美贸易战；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许军徽. 2022. "Trump's Young Chinese Allies and Their Anti-Elite Narratives on Social Media" [特朗普的年轻中国盟友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反精英叙事]. IUCJ 2 (Winter), 2-8.

介绍

在 2016年美国大选，人们见证了美国政治极化和尖锐党派偏见问题的出现。例如，年轻选民更少自我认知为保守派，并只有三分之一年轻选民支持共和党 (Galston 2016)。但在中国，相当数量的年轻网民也积极参与美国大选的论争之中，并且他们的观点似乎与其美国同龄人大相径庭——支持特朗普的情绪在中国千禧一代中绝不是孤立现象。

尽管许多数据分析显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成为预测是否为克林顿或特朗普支持者的一个重要指标 (Center 2018; Silver 2016)，中国随后一项研究显示许多特朗普的中国盟友实际上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 (Yue, Li,

and Sundquist 2017)。根据英格勒哈特 (Inglehart) 的后物质主义假说，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已经让年轻人深深受益的国家中，自我表达、个体自治以及对建立多元包容社会的追求更加难以阻挡 (Inglehart 1981)。然而，这些特朗普年轻中国支持者们的叙事似乎与右翼意识形态相一致，例如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敌意，以及对自由派精英的反对（在社交媒体上被蔑称为“白左”或者“白人左翼分子”），甚至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中国青年所形成的观念机制以及这种反常政治态度背后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通过与8名复旦大学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本文将尝试揭示这些令人困惑观点背后的推动力，以及这样推动力所折射出的文化和社会

经济背景。此外，我们还将讨论中国青年一代对民选官员应当代表谁、应当致力于为谁服务的期望。

文献综述

Lian通过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网民们通过嘲弄两位总统候选人从而解构他们的权威。这些网民站在大选论争的外围，他们在网上所表现出的热情更多意在娱乐，而非真正关心候选人所提出的政策或其个人美德（Lian 2017）。但这一陈述低估了网民在具体政策讨论中的参与，如人们对美墨边境墙以及美国移民相关立法的讨论。

其他消息来源认为，中国大批特朗普年轻支持者的出现的根原于中国媒体的宣传，有关美国政治中混乱和腐败的消极内容被频繁报道（Zhao and Lu 2017）。通过提取人民日报中共219条新闻标题（Shen and Li 2018），传播研究者发现官方报道是如何通过批判美国的民主、驳斥“中国威胁”论以及轻视左派自由人士的理想化倡议来塑造公共话语的。政党的喉舌的确可以是保守的和充满民族主义的；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年轻一代将更容易获取更加多元的观点，特别是那些有出国学习或工作倾向的人。因此，了解网民们的个人背景和他们的政治倾向能有利的检验这一理论。

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对弱势群体有着较低忍耐度的右翼话语已经赢得部分学者的关注（Han 2017; Zhang 2019）。他们认为这种倾向是以现实独裁主义为特点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眼中，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与国家经济发展与安全并不相关，甚至对经济发展或国家安全来说是毁灭性的。另一方面，例如严纪和强权的独裁主义价值观被认为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解释并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且不能阐明他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因此，本研究旨在关注中国网民和大学生的个人特点和观念，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反精英态度的青年。借此，本文试图挖掘这一现象背后未经发现的社会政治动机。

方法论

本文将先对知乎（一个有超过2.2亿用户的热门但有争议的中国问答平台）上关于特朗普和2016年大选的3个访问量最高的问题进行内容分析。每个问题下30个最受赞同的回答将被挑选出来，随后具体分析这些账号用户对特朗普的态度、自身教育水平和海外经历，以及他们在大选中最关注的话题。这样做旨在识别出网上讨论中关于“差异性”（otherness）和分歧建构的主要问

题和关键模式。

除了收集互联网数据，我们还面向8位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大学生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这些被访谈者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并有着多元的学科背景——从计算机科学延伸至管理学、从数学到自然科学，还有政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此外，我们还将对比采访两位不支持或不关心特朗普选举的学生，以便理解这些来自中国精英学府的学生们是如何将自己同“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呼吁联系起来的。

每个访谈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后三个部分都是针对受访者对上一部分的回答情况而制定。第一部分由6个简短的判断题组成，询问他们是对特朗普的娱乐效果感兴趣，还是对特朗普的实际政策感兴趣。如果是后者，参与者将需要比较并评价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同其他自由派精英（例如希拉里·克林顿）政策的差别。在第二部分，受访者将被询问其对美态度在中美贸易争端和美国对华学生签证设限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后，第三部分旨在调查信息来源和同辈压力在形成政治观点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具体来说，该部分将聚焦他们如何回应国内反特朗普的声音，无论是自由派朋友的批评，还是整个贸易战中反美民族主义所表现出的愤慨。最后，问卷会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以便检验他们想要国内民选官员拥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相似或不同于特朗普的特点。这一问题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现实和全球空想之间的相互作用。

早期发现

本研究检索了知乎平台关于“特朗普”的3个访问量最高问题下90个收获最多赞同的回答，从而检验中国网民对唐纳德·特朗普认知的变化。在这些最受赞同的回答中，91.11%的回答（即82个回答）表达了对特朗普获胜的积极态度，而6.67%的回答表达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剩下的回答保持中立。虽然多数知乎用户是匿名的，并几乎没有在其页面上留下个人信息，但是在82位特朗普支持者中有32人展示了身份，有18人甚至分享了他们的教育背景。此外，71.88%的展示身份的用户是拥有超过10万点赞的互联网意见领袖，其中28.13%用户曾在海外学习或生活。在公开教育背景信息的用户中，有61.11%在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学习，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康奈尔大学，27.78%的人来自中国前10名的大学，如清华大学。下图为知乎回答中关键词的词频云（图1）：特朗普同“工人阶级”、“沉默的大多数”、“由华尔街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白左”）以及希拉里在关于“穆斯林”“非法移民”“平权法案”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政治正确”导致了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同时，只有6个知乎回答和1个受访者提

及了特朗普的娱乐效果。



图1. 知乎上有关美国大选所聚焦的关键议题

因此，知乎上很大一部分特朗普的中国支持者显然有过在两国的顶尖高校就读的经历、具有一定互联网影响力，或是曾出国旅行。他们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同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一现象也值得进一步调查。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本文将把研究对象限制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并详细探讨他们支持特朗普政策的原因。

在所有知乎回答中，支持特朗普的用户大多认为美国正面临着挑战，而特朗普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发挥了作用。一位曾在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金融工程的知乎用户强调历史背景是如何帮助特朗普获胜：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经济优势的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紧随美国工业快速外包而来的失业率增长。他相信，特朗普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激发的怀旧之情（通过围绕“再次”这个词）、人们从他通常不用稿子的演讲中察觉到的坦率以及他不亏欠那些脱节的亿万富翁捐赠者任何东西的这一事实（因为他自己就是亿万富翁）正是打动美国普通民众所需要的东西。另一位来自山东大学的物理学专业学生的发帖中聚焦美国当前的“文化战”。他自己选择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声称特朗普是停止美国人口“拉丁化”的唯一选择，而民主党的政策只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大多数回答认为美国正处于瓦解边缘，并表现出对建制派精英处理美国所面临挑战所采取方式的不满。一位在北京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坚持认为，公共安全、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对于学者而言最为重要：“如果自由派的政策被采纳，美国和世界都会充满动荡和骚乱。”对“法律和秩序”表现出类似关切的另一位用户也表现出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提出对处理“来自非法移民和穆斯林”所产生公共安全的关切，并认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相比于处理“例如堕胎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琐碎问题”更为重要。他们声称，左派的议题只代表那些受益于全球化过程的特权者的利益。“生活在一个叫做华盛顿的泡沫中，他们的政策注定会让普通民众失望。”然而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始终在强调

收回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和推崇美国利益优先的重要性，这让他成为特朗普的中国爱好者中成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上帝。

总结来看，一些公开表现出对特朗普支持态度的中国青年在中美两国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最大的关切聚焦于政策，而非特朗普的娱乐性质。另外，他们对于这场大选的观点是由他们对美国社会弊病的诊断和他们对于像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的政治精英提供的处方的不满所塑造的。在下一部分，本文将试着探寻问题的症结，即形成这种信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种信念在政治气候改变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下）会如何发生变化。

讨论：特朗普热背后的迷思

1. 实用主义的正统观念

尽管特朗普蔑视政治正确，他还是得到了来自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关注和称赞，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实用主义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产生自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一位来自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被访者在描述特朗普在任期间繁荣的股票市场以及强势的就业表现时如是说（这项研究于2019年春完成，远早于疫情和经济衰退）。不计特朗普在任期间所产生的混乱局势，支持者认为特朗普证明了他自己有能力让经济复苏，美国经济所取得成果稳固了其采取手段的正当性。社交媒体上另一个引用邓小平言论的帖子同意这种对于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破坏政治正确只能表明他的‘实事求是’。当他找到商业成功和治国安邦之间的相似点时，这就表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知乎的许多用户尤其认为特朗普所著的《像冠军一样思考》中的实用主义想法是脚踏实地的。

同时，这些发现展示了中国政府有关创造经济奇迹的官方叙事是如何塑造了人们对外国事务的立场和话语。这种实用主义的正统观念可以被解释为吸取过去的教训并且采取效率最大化的手段。虽然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权力应当由道德和伦理维护，但他们同时也认为结果重于手段。这可以解释中国人在特朗普大多数政策上持有的实用主义视角，也可以解释他的不道德或者无礼行径是如何能够被接纳的（只要这有利于经济和国家安全）。

此外，对照组的另一位被访者阐明了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与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感之间的联系。这位被访者认为普选在任何大国都是“不可靠的”，而美国的选举对于理性和国家治理的连续性都是有害的。“由于互联网增加了在线政治交流的速度和体量，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对公共观点的操纵和曲解。”这一回答来自于一位不支持

任一候选人的学生。这一观点呼应了王正绪关于中国民众支持民主政治的研究 (Wang 2007)。据他所称, 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政治, 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先于言论自由和其他民权利。

简言之, 讨论的第一部分调查了为什么人们如此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即使他在加剧性别、种族和经济不平等所犯下的系列恶行。正是实用主义的正统观念让我们的被访者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成为这个一直吹嘘自己成功地通过牺牲政治正确来拯救经济的人的忠实支持者。但是, 这种解释只聚焦于政治环境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 实用主义与经济共同繁荣), 讨论的下一部分将聚焦于对个体经历的分析。

2. 通过代际联系和共同记忆而形成的 高水平的不平等观念

这一部分尝试回答了为什么特朗普的中国支持者们频繁提及“美国工人阶级”并将之作为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的案例。本文发现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学生强烈的不平等观念认知有很大关系。这种对不平等的意识在发达经济和种族隔离社会中十分罕见, 但在中国这个经历过三十年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国家, 这种意识可以通过代际传递甚至形成他们的共同记忆。一位来自江苏省的被访者向那些遭受全球化不平等分配之苦的美国人表达了同情, 因为她仍记得在家乡许多这样鲜少受到关注的人群。她记得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意味着什么, 她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童年回忆总是让她想起这些苦难。这导致了她之前在美国交流时所产生的严重认知失调: 当她的美国同龄人如此热情地拥护少数群体权利时, 她想要的只是社会流动和发展机遇。

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似乎知乎上支持特朗普的人很多, 而与其相似的美国论坛平台Quora上反对特朗普的人反而更多?”——显示, 许多中国学生是其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因而产生阶级差别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在中国, 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学生和底层中产阶级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因此更加认识到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力量, 他们相信, 如果沉默的大多数人可以像中国革命时期那样被动员起来, 那么, 他们可以撼动整个政治生态。因此, 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学生面对特朗普所受到的追捧并没有像他们美国同龄人那样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 而是将之视为长期政治焦虑的爆发。

群体间互动有助于减少偏见并建立信任。特朗普的中国支持者们通过长期互动增进彼此了解后, 其作为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或关于该身份所伴随的任何消极标签对于他们来说将变得晦涩和多余; 相反, 他们会完全在个体的层面上看待底层中低产阶级。成功的跨阶级交流因此能

有效的推动消除对外群体的同质性观念, 对其他群体中的人持有更为积极的观点也就成为了可能 (Brodt and Ross 1998; Mason et al. 1998; Rothbart and John 1985)。来自社交媒体的证据似乎呼应了这一解释: “由于这种理解, 中国人不会把美国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都归类为有着道德缺陷或者仅仅是疯癫的人, 他们相信许多美国人支持特朗普是有原因的, 在道德制高点评判他们是不公平的; 中国人会对那些工人阶级的人们表达同情, 而不是刻板地将他们视为缺乏才智和批判性思维的极端主义者。”

3. 感知到的个人利益的收益和演变中的信念

如果前两个因素是基于他们对美国社会、对为提振经济所需付出牺牲的理解, 那么显著的个人所得感是解释他们支持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本文的下一部分试图展现这一因素下的动态图景, 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中美贸易战前后以及美国对留学生签证新政下的变化 (特别是后者)。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 知乎上的一个帖子称, 相比于希拉里·克林顿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人权外交手段,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者姿态和“美国优先”的决议将使中国更为受益。在贸易战和知识产权争端之后, 该用户称, 特朗普对中国中兴和华为发起的攻击将促使中国发展自己的芯片并追求技术自主。同时他指出, 新一轮中美针对贸易协商不仅仅是中美内部的, 而且是美国与其众多盟友间的。美国在这些贸易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极大可能会疏远其同盟, 从而有利于中国。

除了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可见的收益, 另一位被访者则提到特朗普如何从个人利益角度使其获得部分中国年轻人的支持。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政治专业的学生称, 许多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对特朗普在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和严格移民政策上的强调表示支持。他提到, 相比于其大学所在加利福尼亚州 (美国的一个蓝州) 年久失修的机场, 红州的许多机场的条件要好得多。一个居住在美国、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人相信自己绝不会支持民主党。因为他认为民主党人因为担心政治正确的问题, 拒绝接受更少的“非法移民”, 拒绝为中产阶级降税。此外, 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则是在大学录取问题上, 他们相信民主党的做法会让非裔美国人受益, 而损害那些“讽刺地将精英教育视为珍宝”的亚裔美国人的利益。

人们的观念似乎在最近的贸易战和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进行签证限制之后 (特别是在进行签证限制之后) 产生了分歧。虽然3位被访者 (主要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和国际政治系) 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加剧了文明冲突、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将这个政

策正当化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新签证限制政策以及美国对华裔科学家的“迫害”在年轻中国大学生中引发不小愤慨。“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他利用人们对中国的仇恨和敌意来侵犯学术自由。”一个被访者抱怨道。此外，从这次访谈中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签证限制对人们出国留学的选择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10位被访者中的5位声称正在考虑前往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留学。正如一位数学专业的学生所说：“虽然顶尖的学生仍然能够得到理想高校的录取通知，但许多与我相同背景的人确实在考虑德国或法国的高校作为替代。”

总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对于那些大学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其签证限制以及对对中国学者的攻击已经在那些接触更多学术界声音的人群中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和沮丧，并且迫使他们重新规划人生。

4. 魅力型领导风格

最后，我们来探讨围绕特朗普所形成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的特点是对非传统型领导的情感忠诚。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描述了这个世界如何走向不可阻挡的善恶两极分化、走向现存的传统和制度，而且，我们将使用他所说的“人格魅力”一词去调查这一现象（Weber 1978）。

当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对特朗普政策的看法时，许多人提到他们惊讶于特朗普在兑现其诺言上的决心和坚持，比如建造美墨边境墙、与主要贸易伙伴重新修订贸易协议来扭转逆差。运用行政命令来建立边境墙的行为还得到了国际政治系的一位学生的称赞，他说：“这证明了他是一个‘坚定’的人，而不只是为了选票而吹嘘自己。”另一位在清华大学学习经济与金融专业的知乎用户引用了曹操（《三国演义》中最强大的军阀之一）的名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称赞特朗普如此高龄却仍然为美国做贡献，特别是在一些像移民和种族冲突这样艰难的挑战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找到了特朗普在1988年采访中抱怨美国总被其他国家讹诈的视频，企图说明他与许多职业政治家不同——在30年后仍然坚持自己最初的抱负。

唐纳德·特朗普在中国的青年支持者们对其的情感依恋并非总是理性的，因为这场贸易争端毫无疑问将损害普通中国人的利益，而特朗普为维护美国所做的抱怨和他任职的年龄远非罕见。组织科学的文献已经提供了关于魅力型领导所产生激励作用的关键见解：因为魅力型领导让他们追随者的自我认知同领袖自身所阐述的使命相结合，然后反过来对追随者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产生强烈的积极影响（Conger and Kanungo 1987; Conger and Kanungo 1998; Shamir, House, and

Arthur 1993）。也就是说，身份感和自我概念化被嵌入在特朗普支持者的心中，追随者、领导和情境注定会交织、纠缠在一起。

结论

总之，这项2019年的研究表明，特朗普年轻的中国“盟友们”主要关注特朗普的特定政策而非娱乐性报道。有关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精英们在身份政治上提出的不得人心的议程得到他们的特别关注。他们信任特朗普是因为他代表着被孤立的美国工人阶级白人的心声和愤怒，而建制派所提供的处方在他们看来只会加剧这些已经存在的问题。

这种情绪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但大致可以被划定在以下四个范畴：（1）实用主义的观念解释了他们对特朗普的无礼甚至不道德行为的极大程度忍耐。自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基于这一观念。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就业数据和股市保持正常，那么这种良好形势就可以证明特朗普为了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正当的。（2）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联系相当紧密，这种联系通过代际交流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即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同情那些追捧特朗普的、艰苦的底层中产阶级。（3）可感的利益所得也是他们支持特朗普任职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们相信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会有利于中国的崛起。随后的贸易争端并没有显著打击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热情，但是签证限制、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在这些大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情绪。（4）马克斯·韦伯魅力型权威的概念解释了人们何时会向政治中非传统面孔表现出忠诚，并从而正当化他们总统身份这个基本问题。这一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共同身份，而这种共同身份的特点即是对领导本身的忠诚。即使这似乎并不理性，且似乎支持他担任美国总统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访谈的最后一部分的开放性问题是关于年轻学生对他们自己领袖的期望。相比于他们已经向特朗普表达的尊敬之情，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着更多元的政治偏好：（1）其中一位被访者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但是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国家利益这一问题的程度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中国领导永远不应该步特朗普的后尘而把我们的友国推开。（2）我的被访者中有3位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审慎型领导。这种审慎来自行政管理的经验和一种“历史责任感”，还来自把后代福祉而不是如何将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最大化放在优先位置。（3）更多元和包容的意识形态也在中国青年中获得支持。一位被访者认为全球化在长远角度来看仍然让我们受益；另一位被访者认为领导应当用一种更为人道主义的

方法治理国家。还有一位被访者虽然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是确信商人无法治理国家，就像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问题不应该服从市场规律。

(4) 来自数学学院的最后一位被访者认为，中国应当由懂得技术潮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治理，而应该减少对诸如思想政治教育等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

总之，这次对特朗普的中国支持者们的研究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实用主义如何塑造了精英学生的叙事、中国的现代化如何促成了跨界层的互动、他们所感知到的利益如何产生、领导魅力如何催生出违反理性选择理论的新身份这系列问题提供深入见解。此外，本研究还呼吁人们关注并进一步研究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领导的态度比起对特朗普的看法要丰富得多。

参考文献

- “An Examination of the 2016 Electorate, Based on Validated Voters.”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9,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8/08/09/an-examination-of-the-2016-electorate-based-on-validated-voters/>.
- Brodt, Susan E., and Lee D. Ross. 1998.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Overconfident Social Prediction.” *Social Cognition* 16, no. 2 (June): 225-52. <https://doi.org/10.1521/soco.1998.16.2.225>.
- Conger, Jay A., and Rabindra N. Kanungo. 1998.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 1987. “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2, no. 4 (October): 637-47. <https://doi.org/10.2307/258069>.
- Han, Donglin. 2017. “Is China Ready for Foreigner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no. 2 (May): 120-43.
- Galston, William A., and Clara Hendrickson. 2016. “How Millennials Voted This Elec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21,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6/11/21/how-millennials-voted/>.
- Inglehart, Ronald. 1981. “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880-900. <https://doi.org/10.2307/1962290>.
- Lian, Ximeng. 2017. “外围狂欢：基于微博平台的国外时政段子架构的分析——以《人民日报》‘特朗普竞选成功’微博评论为例。” *新闻传播*, no. 22: 5.
- Madon, Stephanie, Lee Jussim, Shelley Keiper, Jacquelynne Eccles, Alison Smith, and Polly Palumbo. 1998. “The Accuracy and Power of Sex, Social Class, and Ethnic Stereotypes: A Naturalistic Study in Person Percep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no. 12 (December): 1304-1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82412005>.
- Rothbart, Myron, and Oliver P. John. 1985.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Behavioral Episodes: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1, no. 3 (October): 81-104.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85.tb01130.x>.

- Shamir, Boas, Robert J. House, and Michael B. Arthur. 1993.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 Self-Concept Based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4, no. 4 (November): 577-94. <https://doi.org/10.1287/orsc.4.4.577>.
- Shen, Hao, and Yuru Li. 2018. “官方媒体对‘美式民主’的解构-基于《人民日报》2016年美国大选报道的框架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no. 2 (February): 44-48.
- Silver, Nate. 2016. “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 *FiveThirtyEight*, November 22, 2016.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education-not-income-predicted-who-would-vote-for-trump/>.
- Wang, Zhongxu. 2007.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 no. 53 (October): 561-79.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0701562283>.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ue, Jiahua, Yuke Li, and James Sundquist. 2017.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ts Chinese Aud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Media Processing, August 11, 2017.
- Zhang, Chenchen. 2019.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ntity, Otherness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ebating World Politics Onlin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no. 1 (May): 88-115. <https://doi.org/10.1177/1354066119850253>.
- Zhao, Min, and Ye Lu. 2017.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大选——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涉选’内容的观察。” *新闻记者*, no. 1: 28-35.

附录

- 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时候，请对一下几个问题回答是或否：
 - 你是喜欢“大美兴川普王”这类互联网玩笑以及一些特朗普段子嘛？
 - 或者有没有关注他的家族企业，尤其是他优秀的女儿？
 - 有没有觉得他当选会让美国陷入混乱与衰弱状态对中国是一个利好？
 - 有没有觉得他对精英的嘲讽让你很开心？
 - 你支持他更多是因为相信他的观点，还是民主党实在是太烂了？
 - 你更加关注上述这些花边的内容还是他的具体政策？
- 他的哪些政策或者看法更加吸引你？/他的哪些花边内容或者言论更加吸引你？
- 具体政策继续追问：比起白左这一群体，你为何觉得他的这一/这些观点更加适合当下的美国？
- 贸易战以来，你对特朗普政府和他本人的执政

又有什么新的看法？

5. 特朗普对于中国学生签证的政策是否对你造成影响？尤其是赴美留学工作？

6. 你平时从哪些渠道获取美国新闻？（停顿）他们对特朗普的争议性的观点你如何消化吸收？

7. 对于身边的那些坚持支持希拉里或者讨厌特朗普的人有什么看法？（停顿）无论是在中国和在 美国都有大量的两极化的群体，美国很多大学生更倾向于反对特朗普；现在贸易争端也加速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讨厌特朗普政府，他们的存在是否对你造成了压力和影响，改变了你的一些认识？

8. 那你觉得如果今天中国开放竞选制度，什么样的领导人是你想要选的？还是特朗普这样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你觉得他独独适合当时的美国？

信息焦虑后社会主义中国对信息的普遍幻象

吴唯莹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23级

摘要: 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后期, 中国经历了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广播、广播和电视的普及增加了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参与, 并逐渐改变了大众对生活、社会和现代性的想象。虽然人们普遍将技术进步视为进步的指标, 但随之而来的信息爆炸导致工人阶级深感焦虑。本文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信息热潮。”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参与信息概念和媒介的十年, 并伴随着对未来信息社会的期待和焦虑, 并探讨了公众情绪背后的公众情绪与中国权力转移、意识形态真空和阶级身份转变背景下的“信息热”有关。

关键词: 人体科学、信息、中国经济改革、技术进步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吴唯莹. 2022. "Information Anxieties: Popular Imaginations of Information in Post-Mao China" [信息焦虑后社会主义中国对信息的普遍幻象]. IUCJ 2 (Winter), 9-14.

简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到八十年代, 中国进行了大量前沿的科学研究, 其中之一便是由中国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所创立的人体科学, 其范围包括研究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和中医系统理论也是一种功能态, 其领域的研究应该被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Xiong, Ye, 2013) 在人体科学创立之前, 大众眼中的气功仅是一种普遍的传统保健方法。但是, 前沿科学对气功的着迷给传统附上了一层神秘和时尚感, 从而使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民追捧, 练习者达到了一亿多人。(Palmer, 2007) 气功运动是改革时期信息科学热潮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官方和民间对高科技和信息发展和传播的高度热情与参与。当时, 时任中国电子部部长的江泽民把信息产业看作“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并鼓励大规模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发展信息科技。(Jiang, 2010) 随着无线广播和电视在中国前所未有地扩张, 公众获取和接触信息的机会显著增加, 人们对社会、生活和劳动的看法也有所改观。(Chen, Sensor, 1997) 本文将主要探讨信息科学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信息热”是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象: 中国处于权力过渡、意识形态真空和阶级身份转变时期。一方面, 信息被幻想为一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解决毛派经济的弊病, 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另一方面, 信息的爆炸及其影响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焦虑。本文将讨论信息热的历史背景; 科学家、政府和公众是如何展示对信息革命共同的热情, 以及在对待问题时出现的分歧。论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人体科学的起源和信息体的概念; 第二部分讨论了信息对于改革期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强调了信息时代的两个关键点——劳动力阶层的变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文章的结论是, 向

信息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焦虑; 通过文学的表达, 大众对信息的幻象体现了新旧改革时代之间的冲突感和紧张感。

文献综述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品普遍认为信息科学和技术是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生产要素。但是, 很少有作品研究信息科学及其相关事物对中国人精神和心理的影响, 这部分作品通常采取虚构的写作方式, 如吴晓波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悲哀》, 哀叹中国农村的道德和精神退化, 工人阶级身份和自豪感的侵蚀, 以及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城市的兴起。尽管如此, 在最近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中, 作家在描写改革后的社会思潮时, 采用了更科学的写作方式。历史学家刘晓的《信息幻想》就描绘了改革时代信息热的起源和影响, 包括气功, 作出了让人信服的评价。本文继承了刘晓将信息视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 并希望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 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三种传统文学——以政党为中心、经济和社会为两翼——的视角来评估向信息社会的过渡。

八十年代的“信息热”和气功的兴起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前卫的科学研究和大众的想象力在关于信息和人体的讨论中找到了共同点。科学家和普通大众都对如何将人类融入无休止的信息流中感兴趣, 而这种信息流主要从外部环境获得。中国科学家研究人体科学, 主要是为了冷战军备竞赛、加强尖端国防和发展太空技术。20世纪80年代初,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欣与钱学森合作, 提出了一个“人-机-环境系统工程”, 通过将人视为一个信息系统, 促进飞行员和飞机之间的无缝交互。开

发这个系统需要对人类行为和人体生理生物数据进行定量分析。(Zhao, Dhillon, 2016 and Huo, 1979)为了获取和研究这些数据,测试对象被链接上了像电磁波探测器一样的仪器——现在是指信息流中的一个控制论主体——以确定信息交换的类型和数量。这些促使了“气功科学”的诞生,钱学森认为这是“揭示人体信息机制的捷径”。(Liu, 2019)



信息锅 (图片来自刘晓《信息幻想》)

中国人对气功与信息系统的联系对来说并不陌生。早在钱学森以前,气就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产生于经络穴位的生命能量,能提供关于人体健康的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气功就已经融入中国的现代卫生和医疗机构。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对气功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古老事物的科学重塑。他在科学界的地位给气功科学带来了更多的可信度和声望。全国各地的气功大师都接受了钱学森的理论,通过宣传气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夸耀气的神奇疗效。本着身体科学观点和钱学森在空间技术方面的专长,气功大师们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准科学发明,信息罐(信息锅)——气功者为了接收来自外太空的信号而戴在头上的一个金属壶,从而形成天人感应。气功大师们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包装这一的传统行业,使变得科学和时尚,吸引生活在改革时代快速现代化步伐下的人们。这一发明获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80年代末,气功练习1者的数量飙升至1亿人以上。(Palmer, 2007)重新包装的气功让普通人得以一窥前卫的科学世界,感觉自己也参与到了国家最新的科研项目中。这种保持与时俱进的愿望源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伴随着公共生活向后社会主义信息时代的过渡,在后社会主义信息时代,信息媒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无线广播和电视空前发展,改变了媒体作为信息渠道的性质和功能。在过去,媒体主要指有线扬声器,向大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媒体逐渐被“削弱和非政治化”,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信息中立、功利和非政治化的私人空间,传递给家庭的信息不再带有道德和行为的指令性信息。(Liu, 2019)它不再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让他们去倾听

和相信什么。中国公众发现自己迷失在信息爆炸中,没有任何组织、方向和引导。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的“信息匮乏”是一种幸福的无知。(Roy, 2015)当毛泽东主义的烙印被移除,过去的社会主义主体被迫接受一个信息扩散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信息被赋予科学、自由和现代的内涵,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不跟上信息,就会被认为是自由或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渴望抓住任何可获得的东西,使自己更有知识和科学素养。除了练气功和使用信息罐,科幻小说也是缺乏知识的人反思科学的渠道。从1976年到1981年,大约有600部科幻小说和故事以书籍或杂志的形式出现。1978年,像《科学文艺》、《智慧树》、《科幻海洋》、《世界科幻译丛》、《科幻世界》等科幻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Liu, 2019)尽管这些科幻故事有些异想天开,甚至有些荒谬,但它们将复杂的前沿科学简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并将“信息”等关键词转化为流行文化中的流行语和神秘能指。

中国的政治发展对“信息热”的塑造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领袖向现代化技术官僚精英的转变。中共政府最近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紧紧围绕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计划,弥补苏联式经济体系的低效率”,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Burton, 1987)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后毛泽东时代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要快速发展电子计算、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关于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各种预言在中国广泛传播,引起了许多人对的关注,尤其是在阿尔文·图尔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在后毛时代政治幻灭的氛围中,科学优先于意识形态的心态很普遍: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非理性和不人道的,但科学被赋予了超越意识形态冲突的力量。改革派试图用中立和乐观的科学理念来与过去保持距离,并证明他们的技术官僚统治是客观的,是对中国有利的。但我们要注意到,改革步骤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而是见机行事和临时的——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看一步,走一步”(先走一步,然后决定下一步)。(Bai, 1985)批评者对这一现代化方法提出质疑,理由是这种方法“非原创”、过于“西化”和缺乏“社会主义道德”。这种争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张之洞提出的“体用之争”——即中国能否在应用西方技术的同时保持其自身的社会文化规范,还是只能“全盘西化”来达到真正的社会进步。改革派为辩护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只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Hu, 1984)为了更有力的说服批评者,胡耀邦有选择地引用了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

告，其中写道：“中国各政党的政策和实践对人民的影响，说到底是好是坏，是大是小，要看它们对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有没有帮助，有多大帮助”。批评者和改革派都强调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革时代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如果中国放弃社会主义事业，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合法化性问题，加上借助毛泽东权威的需要，导致了这样一种推论。本质上讲，改革派精英面临寻找接班人的困境。

除了政治叙事上对毛泽东的影射，中国科学家的科学叙事也让人联想到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钱把身体科学比作共产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改写为“一个身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之间游荡”，认为身体科学“不仅是科学革命，也是文化革命”。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新时代”的畅想“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冲动”，唤起了对毛泽东理想主义时代的怀旧之情，因为两者都承诺了强大的工业实力和更繁荣的社会。突破人类身体的时间性和极限的愿望也与大跃进的雄心产生了共鸣。大跃进假想了一个可以不眠不休，昼夜工作的“铁人”。(Liu, 2019)

尽管有人们熟悉的理想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特点，但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并不总是为人所接受。虽然精英们确实在普及科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大众正在进行的那种科学讨论。大众缺乏适当的科学教育和培训，导致了许多错误观念产生，使神话和伪科学广泛传播。1989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于光远任感叹道：“80年代中期的那段时间里……伪科学如此盛行，以至于人们都没有进行反驳，发表专业文章的机会，这些文字要么被拒绝，要么被完全忽视。”(Li, Fu, 2015) 1982年时，他就在中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超感权力的考察与批判》的报告，而这只是政府不在欢迎科普叙事的开始。(Yu, 1982) 科幻小说，代表了公众对技术官僚未来的幻想，在1983-1984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这一流派以前被誉为“科普”的重要形式。1994年，中国共产党也改变了对气功的容忍和认可，谴责气功是“伪科学”，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气功热。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公众的看法与党对科学的看法并不一致，也表明了党对技术官僚信息社会的设想中，不乏混乱和冲突。总之，向设想的信息社会过渡充满了出入和矛盾。随着革命神话及其宏大叙事的瓦解，各种形式的，来自科学家、公众和官员的欲望和想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争相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白。

向后毛泽东信息社会的过度

尽管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过程存在争议和冲突，但这一转向确实给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留下了持久深渊的影响。一个是新的劳动力等级制度，一个对知识经济的日益重视。总的来说，它们为中国向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过渡创造了条件。

普遍的身体科学叙事，加上国家对工业效率的重视，把工人从政治的、无产阶级主体转变为中立的、非政治的和功利的信息主体，这从当时的影视和文学中就能看出。1980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样机，被誉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随后，机器人成为小说故事、杂志封面，甚至出现了像《园园和机器人》(1980年播出)、《小小机器人》(1981年播出)这样的儿童电视节目。同时，中央电视台也引进了各种以机器人为主题的日本儿童科幻片，如《铁臂阿童木》、《怪博士和机器娃娃》及《哆啦A梦》。这些作品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在城市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些日本动画——受到了日本国内工业化和数字化成功的启发——传播了一种技术官僚式的乌托邦社会愿景，友好的机器人存在于人类社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事基本工作以及抵御敌人和自然灾害。大众文化中英雄机器人形象，阿童木，哆啦A梦和阿拉蕾，在改革后的中国青年和流行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扭转了毛泽东时代对英雄人物的推崇，比如劳动模范雷锋、人民英雄刘胡兰和小兵张嘎，他们故事在儿童电视剧、电影和戏剧作品中广泛流传。不断变化的文化趋势开始为中国的时代榜样树立新的时代楷模——机器人，具有科学和超高效的特点，而非艰苦、利他和正义，无形中结束了对农民、工人和士兵健壮身体的颂扬。

尽管媒体在大肆宣传机器人，但也有人对其去政治化和去人性化的副作用感到忧虑。批评者认为，技术官僚主义发展，加上信息体的前卫科学理论，将工人变为纯粹的技术工具，侵蚀了工人阶级的精神和威望，并为一个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辩护。那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作品中也反映了这种忧虑，1981年出版的热门科幻小说《一个奇怪的案例》，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医生医术高超，让人类医生自愧不如，感到羞耻，可最终人们发现，这个机器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这部小说暗示了一个黑暗的、反乌托邦的未来，在那里，工作完全不需要人类进行。故事主角机器人医生芳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研究的最高成就”。她的医学知识来自人类医生丰富的知识数据库，这使她能够做出最准确的诊断并进行最困难的手术。

对这种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医生的想像，不仅仅出现在科幻文学中。在同一时期，中国科

学家们也在研发一种专家系统，把人类知识转移到计算机中，包括收集某一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并储存在计算机里。这一科研项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1983年，在时任总理赵紫阳发表的演讲《一场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战略》中，将信息科学和微型计算机研究定位为中国在全球技术竞争时代赢得成功的关键。然而，精英们的乐观态度并没有被社会中的每个人所理解，尤其是工人阶级们发现自己将会被科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科幻和通俗文学成为社会成员表达对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不满、焦虑和恐惧的渠道。这些情绪就体现在机器人医生的结局中：看似无可挑剔的芳芳为了治好病人的头痛，尝试打开病人的颅骨，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缺陷。经过调查，人们发现原因，林科学家在创造芳芳时，忘记了在系统中输入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机器人医生的故事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20世纪80年代劳动和工作伦理的困境。它表达了人们对机器的不信任感，但此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通过强调机器人医生缺乏道德观念，通俗文学试图维护人类工作者相对于非人类工作者的尊严和优越性。我们也将这个故事进行政治性的解读，即探讨政府对劳动力格局变化的态度：科学家未能为芳芳设立道德观念，隐喻精英们在追求技术进步时忽视了人类的精神。这种叙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焦虑，他们缺乏知识、没有机器般的效率和精度，非常缺乏安全感。

社会价值的转变意味着新的经济观和个人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观点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预测，随着体力劳动的减少，中国将出现“知识界的崛起”。与贝尔的观点一致，中国作家顾欣预测了“精英统治”在中国的崛起，在中国，权威将以智慧和能力为基础。这些观点与邓小平的发展主义和技术官僚模式是一致的。它们证明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脑力劳动超越体力劳动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中国加入发达世界的敲门砖。然而，这种脑力劳动地位的提升，是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为代价的。在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被大规模的裁撤，同时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精神也受到了侵蚀。对邓经济改革和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困惑和怀疑情绪，引起了“改革文学”的立场转变——改革时期的作品，最初都支持并颂扬改革，但后来又转而同情那些被技术官僚化和资本主义政策冷落或伤害的人。比如邓刚的《阵痛》，于1983年出版，讲述了郭大柱的故事。郭大柱一个勤劳热情的中年技工，因为比不上新款的机器而被降职。改革使他和那一代人变得一无是处、十分焦虑，他们想要通过卑微的工作来追赶时代，比如给上过大学的工程师端茶倒水，但这些工程师在工作中明显缺乏积极性，总是敷衍搪塞。年轻一代，尤其是来自

农村的年轻一代也有这种无助感和追赶的欲望，他们不再享受毛泽东对农民阶级在价值观上的支持。比如在1983年发表的小说《丢失的梦》中，有一个十分渴望进入大学的农村女孩，以至于他在高考落榜时，做出了自杀的举动。她害怕成为像她父母一样的农民或体力劳动者，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学学历上，这样她就可以有一份更好的工作，还能搬到城市居住。这个女孩的个人价值观与毛泽东时代传播的价值观相去甚远。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曾经被誉为模范代表，但现在年轻人却避之不及；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抛弃了大学学历，但对于那些想要爬上社会上层的人来说，大学学历又受到了追捧。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人们对城乡分割日益增长的焦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这种焦虑变得更加强烈。缺乏安全感。

有趣的是，在那部小说中，最终是一位科学家解决了女孩的问题，他将信息编程到她的大脑中，“混乱与重叠，被连续、美丽的对称与和谐所取代。”这个女孩很快就变得学富五车，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女孩的决心，体现了大众对信息的普遍信念，即把中国农村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矛盾的是，正是八十年代的信息爆炸，造成了民众安全感的缺乏，但人们随后又把信息作为解决改革之前社会落后的灵丹妙药。

结论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信息科学的追求是政府、科学界和社会之间的重要凝聚力，也是不安情绪的来源。一方面，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是中国追赶西方的一种方式，是告别毛泽东时代的象征，也是实现技术官僚和发展目标的政治合法化工具。另一方面，公众对信息的热切关注是追赶时代，缓解社交焦虑和技术焦虑的一种方式。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人们的乌托邦幻想愈加疯狂。这些幻想体现在风靡一时的科幻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走向未知的全球资本主义道路时的期待、焦虑和困惑。

参考文献

- Baidu Baike. n.d.a “Jiqiren donghua” 机器人动画 [Animated Films About Robots].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5%99%A8%E4%BA%BA%E5%8A%A8%E7%94%BB/1661810>.
- Baidu Baike. n.d.b. “Yuanyuan yu Jiqiren” 园园与机器人 [Yuanyuan and the Robo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B0%8F%E6%9C%BA%E5%99%A8%E4%BA%BA/2657142>.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N.Y.: Basic

- Books.
- Burton, Charles. 1987.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he Role of the Party and Ideology in the 'New Period.'" *Pacific Affairs* 60 (3): 431–46. <https://doi.org/10.2307/2758882>.
- Chan, Anita, and Robert A. Sender. 1997. "China's Trouble Workers." *Foreign Affairs* 76 (2): 104–17. <https://doi.org/10.2307/20047940>.
- China Writer. n.d. "Deng Gang" 邓刚. www.chinawriter.com.cn, 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06267c404931-28487312.html.
- Dai, Ruwei 戴汝为. 1994. "Renji jiehe de dachengzhihui" 人机结合的大成智慧 [Metasynthetic Wisdom of Human-Machine Systems]. *PR&AI* 7 (3): 181–90.
- Douban Dianping 豆瓣点评. n.d. "Xiaoxiao jiqiren" 小小机器人 [Little Robot].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017863/>.
- Feigenbaum, Evan A. 1999. "Who's behind China's High-Technology 'Revolution'?: How Bomb Makers Remade Beijing's Priorities,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95–126. <https://doi.org/10.1162/016228899560068>.
- Greenhalgh, Susan. 2003. "Science,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9 (2): 163–96. <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2003.00163.x>.
- . 2005. "Missile Science, Population Science: The Origin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182 (June): 253–76.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5000184>.
- Haiwai Huaren Zhongwen Menhu 海外华人中文门户. 2011. "Lao zhaopian: 90 niandai quanmin qigongre xueyuan quanding 'xinxiguo'" 老照片:90年代全民气功热 员全顶'信息锅' [Old photos: 90s Mass Qigong C Followers Wear the 'Information Pot']. May 12, 2 <https://www.backchina.com/news/2011/05/12/140.html>.
- Ho, Samuel P. S. 1997.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during the 1980s—How Effective? Some Evidence from Jiangsu." *Pacific Affairs* 70 (1): 85–106. <https://doi.org/10.2307/276122>.
- Hu, Yaobang 胡耀邦. 1984. "Zui hao de huainian" 好的怀念 [The Best Remembrance]. In *Ai Maozedong Zhongzhi Jiushi Danchen Jinina Wenxuan* 爱老泽东统治九十诞辰纪念文选 [Collection of Article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Comrade Mao Zedong's Birth].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11.
- Hu, Yongguang. 1979. "Dianhua jiaoyu" 电化教育 [Electrified Education], *Dianzi Shijie* 电子世界 1: 8–20.
- Huang, Keming. 1986. "Zhuanjia xitong ershi nian" 专家系统二十年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 System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Jisuanji Kexue* 计算机科学 4: 26–37.
- Huo, Songlin 霍松林. "Chongtan xingxiang siwei: Yu Zheng Jiqiao tongzhi Shangque" 重谈形象思维: 与郑季翘同志商榷 [Back to the topic of image thinking: A discussion with comrade Zheng Jiqiao]. *Shanxi Shida Xuebao* 山西师大学报 4.
- Levenson, Joseph Richmond. 195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9–78.
- Li, Jianhui, and Zheng Fu. 2015. "The Craze for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Qigong Fever and the Science-Pseudoscience Debate in China." *Zygon*® 50 (2): 534–47. <https://doi.org/10.1111/zygo.12178>.
- Liu, Xiao. 2019. *Information Fantasies: Precarious Media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ong, Shengzhao, and Balbir S. Dhillon. 2018.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MSE. doi.org/10.1007/978-981-10-6232-2.
- Mao, Zedong. 1968. „Lun lianhe zhengfu” 论联合政府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Mao Zedong Xuanji* 毛泽东选集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Renmin Chubanshe* vol. 3, 980.
- Mosco, Vincent. 2005.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 Palmer, David A. 2007. *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y, J. Stapleton. 2015. "China's Great Leader." *The Wilson Quarterly*, May 9, 2015. <https://www.wilsonquarterly.com/quarterly/fall-2013-americas-schools-4-big-questions/chinas-great-leader/>.
- Sohu. 2016. "Ribei donghua 'ruqin' zhongguo 30 nian, heyuan 'xiangaiyouxiangsha'?" 日本动画'入侵'中国30余年, 缘何'相爱又相杀'? [Japanese animated film's 'invasion' of China – 'hate and love'?]. December 12, 2016. https://www.sohu.com/a/121088216_400331.
-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n.d. „Zhongguo Kexueyuan Zidonghua Yanjiusuo"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历史沿革)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Shenyang Automation Research Center - History]. www.sia.cas.cn/gkjj/lsg/.
- Shi, Tongyun. 2012. "Chinese Working Class Identity in the Piano in a Factor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I (3): 93–107. <https://web.uri.edu/iaics/files/08Shi.pdf>.
- Su, Kui 苏奎. 2015. "Lixiang, lixianghua, lixiang zhuyi, yu gaigewenxue" 理想,理想化,理想主义与改革文学 [Ideal, Idealization, Idealism and Reform Literature]. *Lanzhou Xuekan* 兰州学刊 9: 18–24.
- Tsinghua University. 2006. "Gaige Shi Zhongguo de di er ci Geming"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Reform is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July 8, 2006. www.dangjiaan.tsinghua.edu.cn/info/1020/1196.htm.
- Wu, Xiaobo 吴晓波. 2011. "Zhong guo gongren jieji de youshang"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The Sorrow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Financial Times*, July 20, 201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9?full=y&archive>.
- Xinhua Online. 2004. "Kaiqi Zhongguo Xinxi Geming Zhengcheng" (开启中国信息革命征程) [Launching China's information revolution journe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ww.most.gov.cn/ztlz/dxp100/mtbd/200408/t20040824_15294.html.
- Xiong, Ye, and Xiaohang Ye. 2013. "Ti yu she hui ke xue de can zhao he xiang guan: cong zi ran ke xue dao tiyu kexue" 体育社会科学的参照和关联:从自然科学到体育自然-人体科学 [References and Releva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of Sports: Somatic Science]. *Shanghai Tiyu Xue Yuan*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37(03): 1–7.
- Yu, Guangyuan 于光远. 1982. "Renti Teyi Gongneng de yanjiu he Xuanchuan" 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ism of Extrasensory Power].

Renmin Ribao Archive. February 25, 1982.

Zemin, Jiang 江泽民. 2010.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msterdam ; Boston: Elsevier/Academic Press.

Zhao, Ziyang 赵紫阳. 1984. “Yingdang zhuyi yanjiu shijie xin de jishu geming he womende duice”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A Worldwid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Our Strategies]. *Zhongguo Jingli Daokan* 中国经济导刊 1: 3–9.



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中国跨国资本：围绕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的叙事

郑铎

纽约大学 16级

摘要： 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SGR）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为建立物质联系和构建叙事提供契机，新的铁路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故事。事实上，围绕着铁路所展开的叙事，已经成为了政府和公众之间关于“何为国家”这一问题的争论点。通过比较叙事研究，本论文调查了中国政府、肯尼亚政府和肯尼亚公众所讲述的有关SGR的故事。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有关基础建设的故事是如何让我们了解非洲现代化和中国全球化的？

关键词： 基础建设、经济发展、标准轨距铁路项目、一带一路、中非关系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郑铎. 2022. “Infrastructural Afro-Modernity with Chinese Transnational Capital: Narratives surrounding the Kenyan Standard Gauge Railway” [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中国跨国资本：围绕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的叙事]. IUCJ 2 (Winter), 15-24.

介绍

2013年，在习近平主席的全新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日报》称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强区域连通性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He 2019)。在BRI的框架下，中国政府一直专注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建设和资助基础设施，以改善交通、贸易和互相连接。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寻求通过其自身领导力创建一个全球经济链。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拥有最多“一带一路”新项目的地区。中国对这些项目的参与规模大层次深。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全球中国投资追踪

系统发布的数据，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的板块中，交通建设获得的一带一路资金最多，其中火车和铁路是引领这些投资的基础设施（AEI 2019）。

早在2000年代初，肯尼亚还在前总统齐贝吉（2002-2012）的领导下，中国就开始投资肯尼亚的交通领域。当时中国还没有正式宣布一带一路。在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2013年至今）的领导下，中国对肯尼亚的发展性贷款急剧增加。在肯尼亚的发展项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标准轨距铁路项目（SGR）。标准轨距铁路是肯尼亚政府采用的全新铁路系统，以取代由英国殖民者建造的旧的米制铁路。

作为基础设施，SGR不仅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空间理，也存在于种种话语叙事中。在《媒体研究的关键词》中，梅丽莎·阿隆奇克将国家定义为“其成员在偶然的和持续的过程中为不同的目标而行动”(Aronczyk 2017, 125-126)。在《追踪帝国的基础设施：关于城市、定居殖民主义和方法的说明》中，德博拉·考文认为基础设施“既是调查的对象又是调查的方法”(Cowen 2019, 10)。结合考文对国家建设的关注和阿隆奇克对基础设施的关注，我将把围绕基础设施的国家叙事作为一种调查方法来研究SGR项目中的权力关系。这一研究方法能使“基础设施引发的斗争变得明显，并让我们了解如何以其他方式建设基础设施，从而重新定义基于联盟、相互性和团结的替代性亲密关系”(Cowen 2019, 15)。

叙事是有力量的。叙事塑造了我们所理解世界，影响我们认知谁是敌是友。在塑造我们如何定义国家的过程中，故事成为国家和公众之间的争论领域。中国政府、肯尼亚政府和肯尼亚公众讲了什么样的SGR故事？哪些故事主导了叙事同质化？这些故事又为谁做了什么呢？

中国国家资本在全球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BRI)的发展模式并不被所有人欢迎和接纳。中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催生了关于中国意图的两极化叙事。中国和美国/欧洲媒体都对BRI项目进行了歪曲的叙事，从而造成了认识上的两极化。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资本是其国家发展的关键。对中国来说，国家投资是请非洲国家搭上中国现代化列车的邀约。对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来说，中国资本被视为具有掠夺性的债务陷阱。而这些观察家的母国也参与了对非洲的主要外援救济。在美国和欧洲，中国在非洲的动作常常被描绘成新殖民主义。中国人的面孔成为新殖民者的面孔(Brautigam 2010)。但很多此类怀疑都是基于对BRI项目的误解。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独特性质能给这些两极分化的说法带来一定。西方的对外援助系统不适合分析中国在肯尼亚的项目。西方外援往往专注于为私人/私企在非洲的投资提供支持。这些投资的重点是实现西方的民主理想，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繁荣非洲倡议”。而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专注于用中国国家资本来资助的别国的基础设施，对被资助国的政治治理标准没有明确要求(Campbell 2020)。美国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报道暴露了美国视角的缺陷。《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关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020年初访问非洲的报道标题是《在旅行中，蓬佩奥向非洲示好以对抗中国》。报道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投资非洲基础设施的懊恼，而并没有讨论为什么非洲领导人青睐中国援助，以及非洲区域政治如何影响了当地人对全球化的情绪(Dahir

2020)。这种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报道非洲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而是为了捏造一个强大且令人恐惧的中国形象。殖民主义的框架也不足以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情况。大英帝国在肯尼亚修建了一条铁路，以巩固对殖民地的控制并获得更多土地。而中国政府在肯尼亚修建SGR是为了扩大经济收益和增强外交影响(Burman and Lonsdale 1992, 16)。

SGR的资金来自中国的国有资本，目的是确保经济利润和外交影响力。本文中的中国的国有资本并不是所有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资本，而是专指中国政府指定的在一带一路中投资于外国基础设施的特定资本。与中国私人资本相比，中国政府对这种资本的控制力更强。与私人资本不同，中国国有资本要实现的目标不仅限于利润最大化。它寻求增加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并期待获得通往新兴市场和潜在自然资源的贸易路线。

与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样，“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做了两类工作：首先是一带一路伙伴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其次是以中国的看法和叙事为核心的软实力工作。Ching Kwan Lee在《全球中国的幽灵》一书中指出，要理解中国在非洲的国家资本的特点，必须把国家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相结合。“集中的控制和分散的即兴创作——都在非洲发挥作用。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1) 政治对于塑造中国国家资本在非洲的利益、能力和影响方面的首要地位；(2) 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Lee 2018, 1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没有权力在非洲制定法律。但是，通过中国立法规范和释放的中国国家资本，其确实对当地官员和立法者制定法律有影响。多事之秋在于，当地的政党和群众都对如何制定法律，以及谁能制定法律有影响。中国国家肯尼亚铁路的权威发言人，它可以通过叙事影响围绕SGR的公共话语。当然，叙事也会受到当地不可预测性的挑战。Ching Kwan Lee提出的交叉模式打破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家资本来殖民非洲的说法。Lee表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国家资本看作是“可量化的金钱、经济投入或政策和政策制定的总量”，而是应该把中国的国家资本理解为“权力的过程和相互关系”。这就为理解市场力量和引导中国国家资本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可能性。它创造了一个框架来比较中国的国家资本和其他国家在非洲投入的主权资本。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当地的抵抗话语权，并不只是把群众的呐喊归类为无奈。“在非洲，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与非洲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相抗衡。中国国家资本的力量受到不断的争夺，并随时间而变化”(Lee 2018, 9)。分析围绕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的叙事，并不仅仅是见证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的悲剧故事，而是要观察不同的SGR故事如何创造出相互影响的内容。这是在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资助的有形基础设施的是如何改变无形的肯尼

亚国家叙事的？”

方法和数据

围绕SGR的大部分研究都专注于经济分析，而我的研究则会聚焦有形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叙事上。我将涵盖SGR的两个主要阶段，即“内马铁路”和“蒙内铁路”。这两个阶段是肯尼亚政府和肯尼亚公众对SGR讨论的核心，因为这两条铁路已经开始运行，而且主要由中国资助。许多机构，而非单一机构参与了报道，所以中国没有关于SGR或一带一路的统一国家叙事。围绕BRI的信息集中化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为了找到最能反映中国国家叙事对SGR的报告，我选择了分析“一带一路”门户网站，这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在2017年推出的门户网站。从一带一路对外交易的大数据可视化到一带一路官方政策，这个门户网站是涵盖一带一路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方面的官方信息门户。

在研究肯尼亚本国对SGR的叙事时，我侧重于两个研究主体：一个是肯尼亚2030年愿景规划的中期计划，另一个是肯尼亚总统府的社交媒体内容。这两个不同的媒体为肯尼亚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服务。前者是由肯尼亚国家计划部每五年以中期计划的形式发布的。中期计划是肯尼亚的国家发展蓝图。它们决定了国家全方位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制定了经济议程，并为肯尼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增长提供了一个框架。肯尼亚总统府则由肯尼亚总统办公室管理。它主要关注总统采取的行动和做出的决定。它还发布视频，介绍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这两个来源都围绕着SGR创造了特定的国家发展叙事。肯尼亚国家叙事分两层运作：一是宏观的国家发展规划，二是微观的公民叙事。尽管现有成就与中期计划中设定的目标相呼应，个人叙事描述了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具体基层影响。

分析来自肯尼亚公众的叙事是由为重要的，因为它反映了当地的抗议和焦虑。这些抗议和焦虑在这类基础设施计划的谈判中往往被忽略。我选择了一些发行量最大的本地报纸和在线新闻网站的内容进行分析。例如，《国民日报》、《标准报》、《东非人》和《明星报》。这些新闻机构有不同的受众群体。《东非人》的受众最广泛，即整个东非地区。《民族日报》的受众是那些会对国家发展和更大的经济目标感兴趣的肯尼亚精英。《明星报》的受众则是社会经济底层的肯尼亚读者。《标准报》是由印度定居者创办的最古老的肯尼亚本土报纸。它与肯尼亚各州紧密结合，受众是社会经济底层的公民，并且关注肯尼亚的边缘化社区。我将着重研究编辑内容，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反应了更大的社会激情和社会焦虑，这些往往都被淹没在同质化的国家叙事中。

国家叙事

中国国家叙事

对南南合作怀旧

当我在“一带一路”门户网站上阅读SGR的检索结果时，我注意到许多文章将“蒙内铁路”比作坦赞铁路的延续。在一篇题为《王毅：蒙内铁路堪称中非友谊新的象征》的文章中，作者声称“蒙内铁路”是新的坦赞铁路。文章写道：“蒙内铁路十分成功，得到了肯尼亚民众热烈欢迎和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堪称新时代的坦赞铁路，正在成为中肯和中非友谊新的象征”（G.Zhang 2020a）。将肯尼亚SGR与坦赞铁路比较并非巧合，而是为中国跨国主义叙事体铺垫了重要基础。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坦赞铁路所传递的团结的信息得已延续。20世纪60年代的中非联盟的怀旧情绪成为今天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奠定了基调，但曾经的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已经淡出了历史。与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提供独立贸易路线的坦赞铁路一样，SGR的定位也是为肯尼亚提供一条面向世界经济的战略贸易路线。但这次不是为了让被殖民国家获得经济和政治独立，而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与美国和欧洲围绕肯尼亚SGR的主流叙事相反，该项目不是基于非理性的政治主张而是基于理性的经济投资目的。事实上，与中国在非洲殖民主义的舆论大相径庭，中国围绕SGR的国家叙事是由坦赞铁路下的反殖民主义叙事延伸出来的。这些文章展示了中非关系的历史一致性，辉映了中建铁路过去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以反欧殖民的愿景下帮助东非建设铁路。SGR铁路仍然是联盟的一个象征，但它不再是以政治立场为中心，而是以中国主导的超级经济链下的经济重要性为中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以“内马铁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一带一路”门户网站总共呈现了30篇新闻报道。发布日期从2016年8月8日遍布到2020年2月9日。在这30篇文章中，只有5篇在标题中提到了“内马铁路”。大多数文章没有详细讨论SGR，而是强调它是组成全球一带一路成就的一部分。在这些报道中，SGR被认为是一带一路的成功案例。这一现象也适用于“蒙内铁路”。当搜索“蒙内铁路”时，门户网站共呈现了201个结果。但在这些报道中，只有17份在标题中提到“蒙内铁路”。其他184篇报道将“蒙内铁路”放在了中非关系和一带一路进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的国家叙事中，SGR被用来展示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而不是当地情况。报告的重点是项目的完成时间、长度和

功能，以展示项目在经济上和建筑上是多么的宏伟。SGR的功能被描述为一个抽象的现代性概念，而不是经济实体。与中国在孟加拉国资建的新桥和在印度尼西亚资建的隧道一样，肯尼亚的铁路是组成中国主导的世界基础设施发展的大故事的一部分。中国在肯尼亚持续投资的国家资本表明习主席和肯尼亚现总统，乌胡鲁·肯雅塔之间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新的SGR铁路使用中国技术建造。记者的照片显示，肯尼亚是“一带一路”大家庭的一部分 (Cao 2020)。中国国家对于SGR的报道是宏观的、全球性的和乐观的。

其中许多报道都是循环使用完全相同的句子，例如“10月16日，肯尼亚内罗毕——马拉巴标轨铁路（内马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G. Zhang 2020b)。在这些报告中，这句话往往是唯一提到内马铁路的句子。这句话同时出现在BRI的年度总结报告中，如《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年》(Cao 2020)。它也出现在季度报告中，如“2019年10月17日。前三季度对沿线国家投资超100亿”(Cao 2019)。这些报道主要关注时间线和突破点。SGR不仅象征着物理空间中基础设施的增长，还象征着人类历史现代化的时间轴。2019年的物质成就意味着这一年是发展和进步的一年。对于大多数收到这一消息的人来说，时间比正在建造的物理结构更具体。他们无法看到正在建造的铁路，但他们知道，在2019年，肯尼亚和中国共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铁路发展。这预示着现在的增长将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即一带一路的核心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作为全球化治理、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外交的关键价值，这一概念在中国关于中非关系的国家叙事中尤为突出。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说，“历史证明，中国和非洲总是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困难。类似的历史经验、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在题为“永远做可靠的朋友和真诚的伙伴”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关系 (Xi 2013)。他明确提到了非洲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如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做的共同努力。习近平对坦桑尼亚的访问，即塔赞铁路的建造地，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怀旧信号。在中国的国家叙事中，中国和非洲在独立时代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在，中国和非洲共享同一个发展的快车道。习近平的讲话将中非亲密关系历史化，为共创未来部下了基础。思想上，“非洲国家和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双方长期的合作历史，结构上的相似性，以及相互合作的未来趋势。20世纪60年代围绕塔赞铁路的叙事着重于意识形态目标上：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在建造一列火车来对抗殖民者。围绕SGR的叙事则主要集中在经

济方面。肯尼亚和中国正在为未来的经济繁荣建造一列火车。这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愿景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发展，从抽象理念到物质需求，从破坏性到进步性的转变。

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是“一带一路”门户网站和中国围绕SGR的国家叙事的核心主题。在门户网站上搜索这个短语时，网站显示了2099个结果，是SGR结果总和的9倍。网站的布局也预示着其全球性的导向。该网站内置了6种不同的语言。网站的右上角总是显示天气信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一带一路的信息。网站的背景是一幅抽象的世界地图草图。在有关SGR的报告中，“命运共同体”这一短语反复出现。大多数的SGR报告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而不是在本地化的背景下。因此，SGR铁路被抽象化，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叙事的背景。此外，SGR的全球化框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它为中国公民创造了一个对中国的普遍理解。它帮助中国人确定了中国在世界中的重要角色。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的领导者。中国不再是追赶者。它正在被追赶。这样的叙事不仅对政府机构，而且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证明了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项目。它告诉中国人，你应该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SGR与其他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一起，为中国主导未来的愿景提供了动力。

肯尼亚国家叙事

把握好时间

《肯尼亚2030年愿景规划》是由肯尼亚前总统齐贝吉于2008年推出的国家发展计划。它“旨在将肯尼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中产收入国家，为我们所有的公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3)。这一发展蓝图是通过5年为一中期计划进行的。到目前为止，肯尼亚国家规划部已经发布了三个中期计划。尽管5年计划制是最近才被纳入肯尼亚国家发展战略的，但自1953年以来，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规划文件。与中国的五年计划一样，肯尼亚的五年计划将经济增长放在国家议程的优先位置。它高度重视交通、能源、资源生产等关键行业的工业化。我认为，5年计划对国家有双重意义：一是集中内部政治权力，二是释放外交信号。对肯尼亚来说，5年计划将国家作为经济进步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者，并使一种源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管理方针国家化。它还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保持一致，使其更容易吸引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

尽管肯尼亚的国家领导层不断变化，致。这些计划在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的五年计划有相似之处。肯尼亚的计划都坚持把基础

设施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基础”(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3)。它们被视为任何经济增长的基础。除了经济刺激,基础设施还被视为改造肯尼亚社会的工具。在第一个中期计划,即2008-2012年中期计划中,它将基础设施列为围绕“国家转型基础”讨论中的第一个分点。所有三个中期计划的拟议方案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建设或更新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港口和铁路。这种转变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认知上的。它影响到政治家、公司和公民如何理解进步这一概念。基于时间轴对这五年计划进展的理解,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预测的未来性相呼应。根据中期计划,像SGR这样的基础设施是一个纪念碑。国家围绕它创造了一个大型叙事,并将其视为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过去和未来区分开来。每一个五年中期计划都在现实空间中标记了时间,而国家则是把握时间的管理机构。国家设定时间,为进步的时钟装上电池。对肯尼亚2030年愿景的制定是对整个国家发展愿景的塑造。它释放的信息是:国家领导者将带领你走向未来。

SGR的肯尼亚国民身份

标准轨距铁路将带领肯尼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标准轨距铁路”这一词汇是最近才被纳入中期计划的,但它在肯尼亚国家发展战略中迅速获得重视。第一个中期计划没有提到标准轨距铁路。在第二个中期计划中,它在不同的讨论和建议中被提到了7次,执行汇总表对其详细说明。在第三个中期计划中,标准轨距铁路被列入缩略语清单中。它在中期计划中被统称为“SGR”(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8)。迅速普及SGR这一词汇表明肯尼亚政府认为SGR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在最近的计划中“SGR”一词处于肯尼亚发展战略的中心,但“中国”一词并没有和SGR一起被提及。事实上,这两者在中期计划中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联系。没有提到中国对SGR的资助或建设,部分原因是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发展的计划。肯尼亚方面完全的沉默与中国国家、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工对SGR的参与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个中期计划定于2013年至2017年。这是“蒙内铁路”建设的五年时间。工程于2014年9月开始,铁路于2017年5月31日开始运营(G. Zhang 2020a)。这条连接首都和印度洋的300英里铁路耗资38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90%,肯尼亚政府出资10%”(Githaiga and Bing 2019)。并且,“蒙内铁路”的大部分工程都被承包给了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在第二个中期计划的拟议方案清单中,有一个执行矩阵详细说明了每个项目的资金来源。其中“SGR蒙巴萨-马拉巴/基苏木”的资金来源为肯尼亚政府,它没有提到中国或

外国投资(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3)。对外国合作伙伴的消除塑造了单一的国家叙事,其重点是国家的自主独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肯尼亚在对于该跨发展项目的叙述是自相矛盾的。肯尼亚通过基础设施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身份,即SGR是肯尼亚的。这样的叙事也集中体现了通过物质经济政策能有效的建立国家身份。

在民族主义叙事的实践中,肯尼亚并不特立独行。基础设施一直是世界各国展现国家独立和执政党力量的媒介。在中国的铁路发展史上,政府同样致力于消除技术和财政上的依赖性。中国的铁路发展故事也常常是通过国家独立的叙事视角来讲述的。

“中国的铁路网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融资和建设的。即使在国有化之后,西方顾问和欧洲与北美的混合方法共同奠定了中国铁路管理、培训和行政的出现。直到二战结束,中国铁路点硬件设备和技术进步仍然完全依赖从英国和美国进口。从1949年到1961年,中国铁路的发动机、铁路设备和技术顾问都来自苏联。中国现今的铁路发展,特别是其高铁部门,亦依赖于技术进口”(Köll 2019, 297)。

即便是近年的高铁发展,也是中国工程师和欧洲及日本工程师之间合作的成果(Chen and Zhu 2007)。他们通过技术转让协议分享高铁制造的专业知识。有一种趋势是,通过不同资源和专业知识驱动的技术来塑造一个单一身份。关于国有化基础设施的叙事允许国家发出统一的信号,但这和任何民族国家多样性本质是矛盾的。这揭示了一个通过基础设施创造国家身份的过程。这揭示了借助基础设施来创建国家身份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通过构建基础设施的叙事来完成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物质基础设施和关于该设施的舆论同等重要,它们服务于独立但相辅相成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国家利用许多工具来构建基础设施的叙事。除了宏观经济规划,SGR的叙事也有通过微观视角构建的。在肯尼亚总统府发布的一系列视频(项目254)介绍SGR为本届政府开展的主要项目之一。该系列还介绍了许多其他项目,如:全民医疗、可负担住房和食品安全。与肯尼亚《2030年愿景规划》的中期计划不同,这些视频是通过亲自采访而非统计预测来确定内容。因为它发布在YouTube和Facebook上,该系列视频是面向公众的。项目254第25集的标题是肯尼亚的SGR故事。截至2020年3月,它已经有49,458次观看。在这段视频中,采访地点的选择强调了SGR对普通人的好处。在视频的一开始,主持人声称,制作这段视频是为了展示了肯尼亚企业和个人是如何受益于SGR的。视频采访了一组受益者:因安全和准时而喜欢SGR的乘客,因新火车站而生意蒸蒸日上的出租车司机,因蒙巴萨旅游

业蓬勃发展预订量增加的酒店等。肯尼亚城市居民的日常幸福感被宣传为SGR存在的主要原因。

这段视频也受用于回答公众辩论中出现的很多问题：SGR创造了什么就业机会？为什么要用铁路而不是公路来运输货物？视频采访了蒙巴萨港的货运工人，他们称，SGR将使蒙巴萨港成为乌干达、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向世界运送货物的主要港口。视频的主持人站在港口的中心，指着集装箱并一一罗列它们的来源国 (State House Kenya 2019)。这展示了SGR已经建立起来的区域连接。它还表明，肯尼亚将竞相成为第一个将整个东非与世界相连的东非国家。个人的经历被转化为国家进步的写照。这些肯尼亚公民的个人叙事被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有关SGR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拼贴画。受访者的个人经验通过叙事被转化为国家经验。由此，SGR的发展就是肯尼亚国民认同的发展。

虽然SGR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项目，并没有和中国一并提起。但中国在中期计划中，被作为合作伙伴和新兴经济体的典范提起。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中期计划中，中国被提及一次，其与印度、俄罗斯一起被称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与正在进入衰退期的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被描述为新兴市场。在第三个中期计划中，中国被提到了4次。两次是在新成立的中非联合仲裁中心的背景下提到的。一次是将中国与以色列和南非等其他战略发展伙伴一起提及。最后，中国被列为一个能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 (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08)。这种比较为肯尼亚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提供了想象空间。它将肯尼亚置于衡量现代化的时间轴上。

中国和肯尼亚塑造的SGR叙事都是为肯尼亚国家的特定目标服务的。SGR象征着肯尼亚的经济进步。它标志着肯尼亚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为外国投资创造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环境。虽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外国资源，但建设过程强化了其国家身份。对于肯尼亚来说，其国家身份是一个工业化的中产阶级国家。这样的身份叙事以国家为中心，成为引领国民走向未来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国家叙事中大力强调SGR带来的好处和达到的成功也巩固了肯尼亚的发展标准。这一标准对执政党十分有利，因为它使该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变得不可或缺。同时，它还通过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所遵循的模式，定义了现代性。此外，肯尼亚能够通过创造民族主义叙事来保持国家独立。

肯尼亚的公共叙事

丰富的新闻环境为SGR创造了丰富而多样的公众对话。从报道的数量可以看出，SGR是一个热门话题。在搜索SGR时，“东非人”检索出了10,100个结果，“国民日报”检索出了1,418个结

果，“标准报”检索出了80,500个结果。肯尼亚新闻界对SGR的讨论量至少比肯尼亚和中国国家的报道数量高出三位数。与肯尼亚和中国的国家报道相比，肯尼亚的公共报道创造了更多元化的内容，吸引了更多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受众群体。它以肯尼亚人和东非人为受众读者，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视角涵盖了更广泛的问题。与国家报告一样，这些新闻机构发布的报告侧重于政策更新和经济事实。除了新闻报道外，这些媒体还发布关于SGR的正面和负面的编辑意见文章。

我将重点关注三个类型的编辑意见。它们并不涵盖肯尼亚公众对SGR的所有态度，但它们揭示了公众叙事中对国家叙事构成了挑战的主体。第一个主题是对信息透明化的需求。曝光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透明度。肯尼亚2030年愿景规划的中期计划大量强调铁路是促进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中期计划和肯尼亚政府公布的内容并没有透露很多关于SGR的具体信息。SGR是肯尼亚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一项闭门交易。肯尼亚议会并没有向肯尼亚公众征求其对SGR的意见。许多关键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肯尼亚政府打算如何偿还中国政府的借款？借款的抵押物是什么？中国人员在该项目中获得了多少利润和收入？在肯尼亚的公共讨论中，不透明已经成为SGR叙事的主要特征。这些文章在其标题中明确提出了对透明度的要求。其中一篇发表在《明星报》上的文章题为“审查SGR下中国与肯尼亚的关系：请公开与中国达成的所有协议：这是确定SGR项目可行性的关键，因为我们的竞争是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Mwaura 2018)。另一篇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的文章题为“为什么国家有义务披露合同的细节”(Kibicho 2019)。肯尼亚公民对肯尼亚政府不回应的愤怒已经慢慢转化为对中国政府的怀疑。

从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合同到SGR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肯尼亚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没有对公众做出回应。直到肯尼亚人民活动家将政府告上法庭，法院才要求肯尼亚政府公布其与中国政府间的SGR投资合同 (Muthoni 2020)。对透明度的要求并不是对铁路的批评，因为很多文章都承认，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这与肯尼亚2030年愿景一致。肯尼亚国民更想讨论的不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必须，而是如何更好的保全基础建设增长和人民的利益。它批评了基础设施将如何融资、建设和运营，从而使肯尼亚人受益并避免债务陷阱。在“肯尼亚的繁荣取决于在港口问题上获得正确的领导”和“政府是否准备在新的十年中建立更透明的伙伴关系？”等文章中，肯尼亚公众将SGR作为一种调查方法，对他们国家的治理实践和民主进程进行问责 (Sunday Nation Reporter 2016; Bankelele 2020)。对SGR更清晰的要求是公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例子，是当地民众对

国家政策不透明的反抗行为。

第二个主题是对当下的关注。中国和肯尼亚的国家叙事关注的是未来。肯尼亚的公共新闻报道的是当下的生活。这类报道涉及SGR在当前的影响，通常是在地方、社区或个人层面。一个例子是关于蒙巴萨卡车司机抗议的报道。自2019年以来，“蒙内铁路”引发了许多当地居民的不满。肯尼亚政府指令要求所有货物都要通过SGR运输。但进入蒙巴萨港的货物通常由卡车而非铁路运输。卡车是蒙巴萨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该指令导致了多起抗议活动的发生，而中国和肯尼亚政府并没有报道这些抗议活动。在《明星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类似香港的抗议活动将冲击蒙巴萨的SGR货运交易：在SGR货运列车开通后不到几个月间，因为他们丢掉了在货运公司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家庭生活在痛苦之中”。作者将肯尼亚的抗议活动与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联系起来，强调货运指令的极权主义影响。对抗议活动的报道代表了SGR叙事中的不同的声音。他们让人们看到了SGR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国家报告中没有提及。除了失业，这类报道还包括其他影响，如环境恶化和土地征用，在“等待政府为SGR项目征用土地付款的痛苦家庭”和“寡妇向法院申请禁止SGR进入她60英亩的土地”中有所体现(Achuka 2019; Ogemba 2018)。

这些文章扩展了有关于国家身份的讨论。它宣称，蒙巴萨的卡车司机和SGR沿线的农村居民也是国家的一部分。由于铁路的存在，他们被边缘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利益应该被优先考虑。目前大众关注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手段，而非目的。公众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物质效果上，而不是对GDP和国家增长的预测。立足于当下，立足于物质世界，对于国家的讨论非常重要。抽象的概念化并非唯一重点，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经验也同样意义非凡。这些微观叙事的报告构成了对肯尼亚生活的大讨论。它们扩大了对国家身份的讨论。在SGR下，肯尼亚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谁的未来因SGR变得更好？谁的生活又因SGR变得不确定？这些故事使基础设施的客观影响具体化，不再被的词藻和庞大的数字抽象化。

第三个主题是对中国贷款和中国劳工的公开讨论。稀缺的信息导致了调查性新闻和公众只能揣测中国和肯尼亚之间交易的真实情况。肯尼亚政府在关于SGR的讨论中对有关中国的问题保持沉默，这使肯尼亚和中国之间的交易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可能导致肯尼亚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对立和猜疑情绪。在诸如“巨型项目中肆无忌惮的贪婪和疏忽”的报道中，记者声称SGR的预算被用于腐败，因为草皮的定价过高(Achuka and Wafula 2020)。在诸如“中国SGR工作人员在肯尼亚过着奢侈的生活”

的文章中，它列出了关于中国SGR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的详细计算结果(Achuka 2019)。这些报道导致肯尼亚人对中国投资SGR的意图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产生了怀疑。与西方新闻媒体描述的中国不同，这类报道其用意不是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掠夺者”，其用意是告诫肯尼亚总统和东非领导人在接受中国贷款时，要制定更好的谈判策略和治理方法。这些报道反映了肯尼亚人民想参与此类国家决定，权衡利用外国贷款发展国家公共交通的成本和收益。

肯尼亚的公众叙述涵盖了与SGR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和人群。在要求更多透明度、展示现有材料和中国参与的过程中，它扩大了国家和公民的讨论范围。它也表明，肯尼亚的不同机构要求政府在地缘政治谈判中考虑公民的声音。肯尼亚公民并没有完全拒绝肯尼亚和中国政府对国家和全球社会的定义，而是创造了一个更具体的对话模式，进而要求讨论应通过什么手段达到共同的目的。

结论

界定非洲现代性

在《南非的中国年》中，黄明伟认为“非洲现代性和中国的跨国主义有其独特的性质。它们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尽管两者均产生于相同的世界历史性力量”(Huang 2018, 148)。在SGR这个受外国、国内和当地影响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中，非洲现代性和中国跨国主义的定义面临了挑战。SGR作为基础设施，定义了肯尼亚的国家现代化、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力和中肯关系。这条铁路不仅连接了空间，也连接了思想和时间。SGR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反映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同时带来空间和叙事的突破，而这些突破超越了现实和想象的边界。大多数关于非洲现代性的文献都没有讨论基础设施或物质性。相反，围绕非洲现代性的学术对话集中在文化、科幻小说和艺术方面。这种对物质发展分析的缺乏，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在BRI框架下与中国跨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交集被忽略了。针对基础设施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影响和塑造了民族国家等抽象意识形态。

“民族是关于身份和文化、边境和边界、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等想法的容器”(Aronczyk 2017, 125)。不同主体会对民族意识进行不可避免的争论，包括政府、公民和外国主权者。与国家控制和传播的国家叙事不同，民族叙事是由国家和公众共同塑造的。民族叙事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被不断争论的领域，争论的问题包括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意味着什么，以及属于或不属于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等等。SGR的叙事由各类信息共同组合：中国

政府媒体和肯尼亚总统办公室宣传了超现代性，肯尼亚当地新闻报道了对再殖民化和虐待劳工行为的担忧，美国媒体呼吁谨慎对待中国的掠夺性贷款。通过对SGR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之叙事的争夺，这场话语权之战反映了各方在软实力方面的竞争。它还揭示了各个主体对非洲现代性的不同阐释，即现代非洲是什么样的，以及一个国家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中国的跨国主义

围绕SGR的叙事揭示了由中国主导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背后的动机转变，即从政治到经济的转变。虽然有所不同，但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时期完成的坦赞铁路已经为BRI下的跨国主义愿景铺平了道路。这个愿景呼应了对“中非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怀旧，并在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得以运作。

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交汇点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它是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工具，在连接国家和建立国家观念方面尤为重要。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实现现代性，一个国家必须建立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设施，在文字和想象上达成国家统一。通过BRI，中国确立了其作为国际领导者的国家身份，扩大了国家边界的概念，同时在物质和话语层面深入到了其他国家的公共空间。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促进其进步标准作为普遍标准的同时向外发出了团结的信号。SGR是中国跨国主义鼓励将中国发展模式作为非洲现代化蓝图的实例之一。

肯尼亚的现代性愿景

基础设施建设在肯尼亚的现代发展模式延续至今，并一直是他们五年计划的一部分。Köll认为，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存在着“铁路和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Köll 2019, 297)。铁路作为商业和行政机构的成功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虽然不一定强大的国家的支持。作为回报，国家依靠管理良好的铁路系统和运输服务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铁路通过其服务支持国家，但它们也象征着国家的权力。”肯尼亚的SGR发展适用这一理论。肯尼亚利用SGR来反映其国家的独立和执政党对经济进步的领导。它允许肯尼亚通过铁路发展创造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身份。但实际上，这种技术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资金、管理和工程专业知识。尽管中国的贷款存在经济风险，但肯尼亚还是押注于中国发展模式上以实现现代化。

肯尼亚的现代化公民模式

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身份所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包容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国家叙事和公众叙事之间的不断互动揭示了任何国家固有的动态力量。SGR受到当地市场、劳动力和社区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影响，并客观上介入了人们的生活。处于多事之秋当地市场给中国跨国主义和肯尼亚现代化模式带来了挑战。当肯尼亚政府宣布蒙巴萨港口中来自中国的货运量增加时，肯尼亚本土的新闻界却怀疑其中存在债务陷阱和腐败。虽然中国和肯尼亚国家都注重可量化的未来和国家统一发展，但肯尼亚人民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通过报道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调查，肯尼亚公众扩大了对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定义。基础设施确实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收益，但它们也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和栖息地的生态平衡。经济和政治的进步可能会以牺牲肯尼亚人的日常生计为代价。肯尼亚公民对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想象对于定义非洲现代化至关重要。他们的生活经验使统计学上的进步实质化。他们的声音为以非洲人为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阐释。我们需要时间来确定SGR对肯尼亚和中国的影响。围绕SGR的叙事显示了跨国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涉及的动态权力和叙事。这些叙事建构与其说是关于目的，不如说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目的。

参考文献

- Achuka, Vincent, and Paul Wafula. 2020. "SGR's Sh1bn Grass: Unbridled Greed and Negligence in Megaproject." *Daily Nation*,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nation.co.ke/nationprime/sgr-china-contractors-kenya/5279428-5467772-hv6mr2/index.html>.
- Achuka, Vincent. 2019. "SGR: A Tale of Poor Millionaires in Kenya." *The East African*, June 22, 2019.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ea/Pain-of-families-awaiting-pay-for-land-seized-for-SGR-project/4552908-5167296-jc03tn/index.html>.
- Allison, Simon. 2017. "The Lunatic Express Rides Again." *The Mail & Guardian*, June 2, 2017. <https://mg.co.za/article/2017-06-02-00-the-lunatic-express-rides-again/>.
- Amienyi, Osabuohien P. 2005. *Communica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 Empowering Development in African Countries*. 1st ed. Routledge.
- . 2019.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ronczyk, Melissa. 2017. "Nations." Essay. In *Keywords for Media Studies*, 125–2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ach, Jonathan. 2018. "China's Infrastructural Fix." *Limn*, January 9, 2018. <https://limn.it/articles/chinas-infrastructural-fix/>.
- Bankelele. 2020. "Is Government Up to More Transparent Partnerships in the New Decade?" *Nation*, June 28, 2020. <https://www.nation.co.ke/oped/blogs/dot9/bankelele/2274454-5413258-qiqvn4z/index.html>.
- Berman, Bruce, and John Lonsdale. 1992. *Unhappy Valley: Conflict in Kenya & Africa: Book One: State and Clas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Biao, Chen, and Zhu Huiyue. 2007. "Era of 'Created in China.'" *China Pictorial*, April 18, 2007. <http://www>.

- chinapictorial.com.cn/en/industry/txt/2010-09/26/content_300367_3.htm.
- Bräutigam, Deborah A. 2009.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ief Introduction."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n.d. <http://www.sic.gov.cn/Column/595/0.htm>.
- Campbell, John. 2020. "Trump's Africa Policy Is Better Than It Look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6, 2020. https://www.cfr.org/in-brief/trumps-africa-policy-better-it-looks?utm_source=twtw&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TWTW+2020April10&utm_term=TWTW.
- Cao, Jianing. 2019. "前三季度对沿线国家投资超百亿美元." Belt and Road Portal, October 17, 2019.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06859.htm>.
- . 2020. "共建 '一带一路' 这一年: 朋友圈持续扩大 国际舆论趋向客观." People Daily, January 19, 202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15841.htm>.
-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9.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 Cowen, Deborah. 2019. "Following the Infrastructures of Empire: Notes on Cities,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Method." *Urban Geography* 41, no. 4: 469–86. <https://doi.org/10.1080/02723638.2019.1677990>.
- Dahir, Abdi Latif. 2020. "On Tour, Pompeo Courts Africa, to Counter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8/world/africa/pompeo-africa.html>.
- DeSanto, Dominic. 2017. "The Kenya-Uganda Railway." Macleki, December 4, 2017. <https://macleki.org/stories/the-kenya-uganda-railway/>.
- "EDITORIAL: Is the Well of Chinese Credit Really Bottomless?" The East African, April 27, 2019.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oped/editorial/Is-the-well-of-Chinese-credit-really-bottomless/434752-5090600-tapfq8/index.html>.
- "First Medium Term Plan: 2008-2012." Kenya Vision 2030. 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08. <https://vision2030.go.ke/publication/third-medium-term-plan-2018-2022/>.
- "The Friendship Road - the TANZAN Railway." Xinhuashe, 1976. <https://chinese posters.net/posters/pc-1976-s-003>.
- Githaiga, Nancy Muthoni, and Wang Bing. 2019.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frica: The Impact of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n Kenya." *China Report* 55, no. 3: 219–40. <https://doi.org/10.1177/0009445519853697>.
- He, Qini. 2019. "China Unveils Action Plan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Daily, December 16, 2019. https://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3/28/content_19938124.htm.
- Huang, Mingwei. 2018. "The Year of China in South Africa."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131 (May): 146–49.
- Jinping, Xi. 2013.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全文)." Xinhua News, March 25, 2013. http://www.gov.cn/lhdh/2013-03/25/content_2362201.htm.
- Kasuku, Andrew. 2019. "Hong Kong-Like Protests to Hit Mombasa Over SGR Cargo Deal." The Star, September 12, 2019. <https://www.the-star.co.ke/counties/coast/2019-09-25-hong-kong-like-protests-to-hit-mombasa-over-sgr-cargo-deal/>.
- Kibicho, Wambui. 2019. "Why State Is Obligated to Disclose Details of Contracts." Nation, February 3, 2019. <https://www.nation.co.ke/oped/opinion/Why-the-government-is-obligated-to-disclose-contracts-details/440808-4964950-tmhmjz/index.html>.
- Kitimo, Anthony. 2019. "Mombasa's Life Ebbs Away After SGR Cargo Directive." Daily Nation, November 16, 2019. <https://www.nation.co.ke/news/Mombasa-life-ebbs-away-after-SGR-cargo-directive/1056-5350790-55y8i6/index.html>.
- Köll, Elisabeth. 2019.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ng Kwan. 2017.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Zhiwei. 2016. "肯尼亚内马铁路项目一期工程开工." Belt and Road Portal, October 22, 2016. <https://www.yidaiyilu.gov.cn/wtfz/ssl/1883.htm>.
- Liu, Haifang, and Jamie Monson. 2011. "Railway Tim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Experts in the History of TAZARA." Essay. In *African Engagements - Africa Negotiating an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226–51. Lieden, Netherlands: Brill.
- Llewellyn, Jennifer, and Rebecca Cairns. 2020.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Alpha History, February 13, 2020. <https://alphahistory.com/chineserevolution/first-five-year-plan/>.
- Muthoni, Kamau. 2020. "State clash with LSK, activist over multibillion SGR project." The Standard,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article/2001356662/activist-state-face-off-in-court-over-sgr-project>.
- Mwaura, Isaac. 2019. "Make Public All Agreements with China." The Star, November 16, 2019. <https://www.the-star.co.ke/siasa/2019-11-16-make-public-all-agreements-with-china/>.
- Ogemba, Paul. 2018. "Widow Wants SGR Firm Stopped From Invading Her Land." The Standard, February 27, 2018. <https://www.standardmedia.co.ke/business/article/2001271310/widow-moves-to-court-to-bar-sgr-from-her-60-acre-land>.
- Project 254- Episode 25 – Kenya's Standard Gauge Railway (SGR) Story; Part 1. YouTube*. State House Kenya,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pVQC-cUNM>.
- Sambu, Zeddy. 2008. "East Africa: Countries Move to Upgrade Railway Network." Ocnus.Net, May 3, 2008. http://www.ocnus.net/artman2/publish/Business_1/East_Africa_Countries_Move_to_Upgrade_Railway_Network.shtml.
- "Second Medium Term Plan 2013 – 2017." Kenya Vision 2030. 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3. <https://vision2030.go.ke/publication/third-medium-term-plan-2018-2022/>.
- Sunday Nation Reporter. 2020. "Kenya's Prosperity Depends on Getting Right Leadership at Port." Nation, July 2, 2020. <https://www.nation.co.ke/news/Kenya-future-prosperity-tied-to-getting-right-leadership/1056-3232988-lmkxa2/index.html>.
- "Symbol of National Railway Administr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Railway Administr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https://baike.baidu.com/>.
- "Third Medium Term Plan: 2018-2022." Kenya Vision 2030. 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Planning of Kenya, 2018. <https://vision2030.go.ke/publication/third-medium-term-plan-2018-2022/>.

- Wissenbach, Uwe, and Yuan Wang. 2017. "African Politics Meets Chinese Engineers: The Chinese-Built Standard Gauge Railway Project in Kenya and East Africa."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13 (June).
- Zhang, Guangling. 2020. "共建 '一带一路' 这一年." *People Daily*,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16989.htm>.
- . 2020. "王毅: 蒙内铁路堪称中非友谊新的象征." *Xinhua*, January 12, 2020.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15182.htm>.
- Zhang, Jiasu. 2017. "'中国制造' 蒙内铁路通车 开启东非铁路网建设征程." *Xinhua*, May 31,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31/c_1121063970.htm.
- "中国外援60年: 对外援助之花在国际合作中绽放."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July 9, 2010. http://www.gov.cn/jrzq/2010-07/19/content_1657841.htm.
-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7, 2000.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10250996.shtml.

美籍华人身份认知和新冠疫情

周敏^[1], 周慧玲^[2], 李悦濛^[3]

[1] 周敏博士现任洛杉矶加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王文祥夫妇基金美中关系与传媒讲座教授。她著有《亚裔美国人的成就悖论》等书籍，研究领域聚焦移民跨国主义、亚洲内部移民、中国侨民、二代移民、亚裔美国人、移民创业、民族语言媒体和补习教育里种族体系等。

[2] 中国传媒大学 17级

[3] 塔夫茨大学 18级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周敏, interview by Huiling Zhou and Maureen Li, 2021年6月4日. IUCJ 2 (Winter), 25-27.



问：新冠疫情前期，国内外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存在着一定争议，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局势产生反转。您认为在新冠疫情不同阶段下，在美华裔群体的心理又是什么样的呢？

周敏教授：我们在美华人的命运跟祖籍国是息息相关的。在抗疫背景下，尽管美国新闻自由，媒体相对更开放并存在不同声音和意见，但自媒体也有很多不真实的信息。不管中文还是英文的自媒体，在疫情蔓延期间都有不少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就我个人观察，在疫情初期，我们在心理上都很彷徨。一方面，各方的“甩锅”行为让人有些无所适从。疫情在短时间内在美国迅速蔓延，一时看不到有何良策应对，这也导致我们情绪比较低落，处于非常担忧焦虑的精神状态。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一年，慢慢地我们就觉得，高度集权的中国对疫情控制就非常高效，这与高度民主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比较自由，然而这种民主自由具有其代价。在中国，集权的代价就是个人自由，但它却非常有效的把疫情控制住了；而美国就没有这样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所以疫情蔓延的非常迅速。每天感染、死亡的数据都让我们非常震惊，后来慢慢变得有些麻木。但近几月，因为美国的拜登新政府防疫措施比较有效，扩大疫苗接种。看着那些数据慢慢降下来，我们的心态才向更正面的方向扭转。现在美

国抗疫取得的成绩也很大，我们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然后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在拜登就任总统的这几个月以来，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

此采访进行于2021年6月（奥秘克戎/德尔塔新冠变种病毒问世前）

问：您先前在接受有关亚裔仇恨事件的采访中曾提到，亚裔仇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个人层面情绪的无法排遣而导致，您可以更详细的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情绪，以致形成这样集体性仇恨行为吗？

周敏教授：在美国仇中仇亚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美国的大众并没有对亚裔进行细分，所以仇中仇亚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更正一下，亚裔仇恨表面好像是由于人们个人层面情绪的无法排遣而导致的，实际上跟种族制度有关。一方面，美国的仇亚情绪是在美国的种族制度下产生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另一方面，这种偏见体现在不同层面的社会互动中，比如有个人层面、地方社区层面，还有政府层面的互动。各种历史和政治因素和个人文化、意识形态因素间的互动形成了这样的仇亚情绪。其实人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一般的偏见不会引起那样大规模、系统化的仇

亚情绪和行为。当它一旦跟某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相联系，比如我们的前总统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政府层面的偏见马上就与大众层面的偏见相结合，激起一种更大的仇恨情绪。此外，因为我们都没有对新冠疫情的袭击作出充分准备，突然之间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也没有方向，很迷茫。所有人都要居家隔离、在家上班、上学，而这样突变的没有被给予适当时间过渡就要求大家大范围地接受。很多人呆在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人总是社会动物，他需要出来与人接触交往，然而居家一下子给人以社交隔离的感觉。所以当大家在强调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时，我们就认为“保持社交距离”这个说法是不对了，我们应该保持身体距离（maintain physical distancing），而应该继续保持社交联系，社交距离和身体距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始时一直在用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离）的提法是不对。正因为我们社交和身体都保持了距离，所以有人就会在高压环境下失去自我和理性，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行为。我平时每天都在我的街区走路锻炼，（疫情开始后）我也开始有一点害怕，因为我自己是亚洲人。开始的时候还没人戴口罩，后来大家都戴口罩。开始时戴口罩，我就害怕被别人歧视；但到了后来，你不戴口罩，也怕被人家歧视。偶尔还会听到有人对着你大叫get off my way（离我远些），第一次也许就接受了，想Okay, get off your way, six feet（好的，离你远点，保持六英尺距离）。但碰多了以后，你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这事就对着我来的。所以，从个人偏见发展出来的因素会跟政府，或领导人、政治家的说法相互影响；此外，还有与社交隔离的环境氛围等多方面的因素互动，形成了所谓的仇亚情绪。

问：如您说，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信息的传播没有得到很好的把关。但另一方面来看，人们也在互联网上宣传着去污名化的声音，由此看，您觉得媒体在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

周敏教授：媒体总是会受大众情绪影响的，特别是西方媒体。因为媒体本身有商业利益，如广告等，所以它一定会受到大众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的影响。而很多自媒体在传播新闻和信息的时候就比较随意，不受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约束，因此有很多假的新闻流传，为博眼球；或者有一些信息可能是真的，但它会被歪曲或无限扩大，于是造成一种很不好、很负面的社会影响，并直接影响个人意见。我有一段时间很少看中文自媒体，或在疫情期间就全部不看，因为其中很多消息都十分混乱，不知道是真是假。美国的主流媒体虽然也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一面，不过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声音很多，加上个人批判性的

分析能力，看起来就还比较靠谱。有些自媒体的东西，比如视频等，就有点不靠谱、混淆视听。

问：说到社交媒体，我们在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下看到，很多亚裔第二代青年和他们的第一代移民父母产生了许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曾有耶鲁学生联名致家长的一封信，以及随后的反亚裔仇恨游行等。您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也有影响亚裔家长这一群体在此类社会议题上态度的改变？

周敏教授：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亚裔社区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社区，除了日本裔，其他大多数族裔的成员都是外国出生的。我自己作为来美国三十多年的老移民，也算是外国出生的这一群体。移民群体还包括了一些比较新的移民，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就不会太多。此外，新移民也由于在美国的经历不同而对不同种族的看法也存有一定的偏见。新移民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取向更多是双文化的，即基于它在中国与在美国的经验。第二代的小孩在美国出生、成长，第二代还包括在国外出生但不到十三岁就来美国的这群人，我们叫一点五代，他们其实除了没有生来的公民权，基本跟第二代是一样的。第二代的移民后裔因为接受美国的K-12教育和高等教育，所以他们跟其移民父母在种族问题上的看法是比较不一样。（在一代移民父母看来）好像移民就是要assimilate（同化）——同化成为白人中产阶级。这是一代移民父母所向往的社会融入目标，这并不是说要变成白人，而是希望他们的子女最终能取得白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在这里出生、受教育小孩的意识意识形态和思维一般是比较开明的，一般来说比较偏向自由派，觉得他们不要被他们的压迫者同化。这其中就存在有三个冲突点。其一是代际冲突，这种冲突在其他美国家庭也比较普遍。其二是文化冲突，因为你从不同的国度和文化来，东西方文化冲突尤为突出。第三个就是社会经验的冲突，小孩子一般与自己移民父母的经历是不同的，特别体现在跨种族交往。父母一般很少有跨种族交往，但小孩子就会有。所以他们一般会认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非常具有激励性，他们有跟其他的少数族裔一样的需求，不希望被视为异类。尤其是我们亚裔，亚裔小孩特别反感他们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或者荣誉白人。在二代移民眼中，模范少数族裔是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一种待遇，是把他们当作他者的一种歧视。但第一代移民会认为：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又怎么了？人们抬举你，敬仰你。但实际上，被抬举和被低看是一样，都是一种社会排斥。You are treated as others. You are not we, you are they（你被当作他者，你不属于“我们”，你属于“他们”。），所以亚裔小孩子就对模范少数族裔特别地反感。BLM运动一开始的时候，

一些比较乖的小孩就希望能跟父母有更多沟通，希望说服父母，而一旦无法说服父母就会导致他们非常苦闷。那时我正在教一门“新二代移民（new second generation）的课，在课上，我的学生会说出自己与父母冲突性交流的经历，有些学生对父母的意见表达出厌倦和无奈的情绪。在很多移民子女眼中，一方面他们很感激父母的付出，但也很对自己父母对社会正义的较低敏感度而感到非常不理解或是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二代的小孩就希望在课堂上有这样的空间来发起讨论。我经常跟他们说，你在家时要和父母平静的沟通，而不能是对抗式的。因为父母有些时候会比较“独裁主义”，会认为这是根据我自己经验作出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其个人经验是比较片面的。父母不会这样认为，所以小孩子与父母作更多的、更理性的沟通。有些小孩还存在有语言问题，所以他们就干脆放弃，从而导致两代人的隔阂更加严重。这种子女与父母间经常性的沟通是有其正面的影响的，因为平静的交流会触动他们的父母去思考；要是没有相关的讨论，他们的父母就会坚持自己旧的想法。这样争论反而会引来父母的思考，在他们冷静下来后也会觉得小孩说的也没错。

问：在亚裔美国人社群内部，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族群对系列“仇亚”事件的看法和态度是否随时间推移存在转变？

周敏教授：有转变。事实上，即便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族裔背景，可能你的观点文化语言各方面都不同，但少数族裔在美国面临着共同的遭遇。这样共同的遭遇就会促使大家团结起来。不仅是亚裔不同族群之间要团结起来，我们还要联合其他族裔的成员。因为争权利不能是为个人争权，而要为群体要，为整个处于不利地位和边缘化的群体来争权利，从而达到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问：您曾在采访中说到美籍华裔在美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为在美生活多年的华人，这些年来您所观察到的随着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有哪些呢？

周敏教授：中美关系就好像一个钟摆，会摆来摆去。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意气风发、昂头挺胸，情绪比较高涨。但当美中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低下头来，就会点害怕、焦虑，就会低调行事。因为很多仇亚事件，其实就是仇中事件。在美中关系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是中国人，然后就是找你说事，并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在你身上。这个影响对于个人是非常直接的。在生活中，比如找工作、或进入某个专业，个人都会直接受影响，如某些专业在美中关系不好的

时候你是不是能进入，或者即便你进入了这些专业，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你都得三思。我们都希望美中能保持良好的关系，要多对话，多交流，尽量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沟通来解决问题。而不要简单的硬碰硬。尽管不能强求对方接受意识形态和信仰方面的意见，但还是有许多共同空间是可以合作和沟通的。



红军：美国人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看法

刘果

哈佛大学 22级

摘要： 本文利用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个人陈述、军事情报报告和军事教育课本，研究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普遍看法。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往往被使用“人海战术”的士兵形象所主导，中国军队则采用了复杂而有组织的进攻和防御战略。本文发现，意识形态、知识和军事优势的信念扭曲了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导致了非人性的、不准确的描述。

关键词：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被遗忘的战争、人海战术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刘果. 2022. “Red Hordes: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hinese Troops During the Korean War” [红军：美国人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看法]. IUCJ 2 (Winter), 28-32.

介绍

对待中国人的非人化态度。

1950年11月25日午夜前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对朝鲜国内的联合国部队发动进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本以为他们能很快击败被逼退到鸭绿江边的北朝鲜军队残部。然而，中国以25万人的军队压倒了联合国军的防线，令其原本期待中的进攻变成了撤退。这一进攻将战争延长了近三年，并将冲突边界推向了朝鲜半岛的中部。在美国人的反击下，双方沿三八线固守在了这条战前朝韩两国的边境，直到达成停战协议。(Peters and Li 2004) 这场战争经常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它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与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越南战争相比。(Cummings 2010) 然而，这种健忘掩盖了这场冲突的重大影响和意义。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所说的对“军工复合体”的贡献之外，许多人忘记了这场冲突直接使中美两国的青年在恶战中对峙，并最终导致超过36,000名美国人死亡，而中国的死亡人数更有甚称高达数十万。尽管朝鲜战争的重要性毋庸

文献综述

目前还没有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为主题的公开研究。然而，有一篇论文是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中关系展开的。此外，尽管这不是其研究的重点，但确有另外两篇作品涉及到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Zach Fredman的论文《从盟友到占领者：1941-1945年与美国军队一起在战时中国生活》重点关注认知问题。他的研究了美军与中国士兵、翻译、妓女和其他平民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导致美中国民对的负面看法。美国人的罪行、性行为不端、暴力和优越的态度导致中国人对其深深地怨恨。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盟友是无能的。Fredman揭示道，这些看法使“这两位盟友早在史迪威离开中国后，冷战开始之前，就变成了对手”。(Fredman 2016) 这些看法还在战后被中国共产党利用，以获得支持从而对国民党作战。

这项研究显示了战争中观念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不仅限于领导人，也涉及士兵和平民。

Bruce Cumings撰写的《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前因后果。他认为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忽视或误解了。(Cumings 2010)此外，库明斯分析了美国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认为美国人在看待和叙述朝鲜战争时相当漫不经心，并且非常看重“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以“中国人以人海战术在雪地上冲锋陷阵”为主。(ibid) Cumings将“朝鲜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模糊印象”与“经过密切观察和大量思考而形成”的中国军队的看法和作品进行了对比。(ibid) Cumings对这种差异的看法在其提出“为什么一个中国士兵能看到这些东西，而美国人却显然看不到？”的问题时表现得很明显。这种差异是指部队对平民的不同态度。(ibid)

Blaine Terry Browne的论文《共同想法：1930-196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印象》加强了Cumings关于中国人的“人海战术”主导了美国人对朝鲜战争看法的论断。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在193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此外，美国人在战争或同盟时期又会重新采纳这些刻板印象，为适合当时情况而片面强调一些观念。(Browne 1985)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一个普遍印象，那就是被洗脑的、强悍的、残忍的士兵。其特点是完全无视人的生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Browne解释说：“面对一个敌对的中国，最可怕的也许是想到了中国无数的漠视生命的群众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人。这种形象有非常显著的普遍性，并且几乎充斥着所有关于朝鲜战争的描述。”(ibid, 385) 从美国人的普遍看法来看，中国的这种“对人命的蔑视”表现在“人海战术”中。“成群结队的中国人不顾死亡地”向美国军队涌去。(ibid, 384)

没有文献专门研究朝鲜战争期间的认知。即使是与该主题有关的研究也是有限的。上述三部作品中有两部是论文而非书籍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将利用包括双方的个人陈述、解密的军事情报，行动报告，以及军事教材在内的原始资料，解释美国人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的看法及其原因，从而填补研究空白。

人海战术的神话

在当时的美国媒体、公众和部队的观念中，中国人不顾敌我生命使用人海战术的形象格外普遍。首先，“人海战术”是一种攻击，即以高度集中的步兵群向敌方防线发动进攻，以数量冲破敌方防线并与敌人进行近身搏斗。(Appleman 1990) 在中国参战后，媒体经常使用“成群结队”或“人海”等令人恐惧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军队的攻

击，这些词汇也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Browne 1985, 385) 这种描述不仅在美国很流行，有证据表明，这些观点在驻韩美军中也很普遍，从最低级别的士兵到将军都是如此。(ibid, 387) 查尔斯·威洛比少将将中国的军事成功归功于“取之不尽的亚洲炮灰”。(Clark 1954) Robert Rigg中校说，对方“无用的牺牲和屠杀”中发动“一波又一波穿着赭色制服的军队”。(Rigg 1952)

然而，囚犯的审讯记录、军事情报、双方的个人陈述和军方的事后报告都有力地表明，这种看法并未客观反映出大多数志愿军的军事行动。解密的美军陆军行动报告引用囚犯笔录和部队收集的情报证实，志愿军的标准战术远非人海战术。当然，罕见的例外也是存在的，例如1951年对砥平里的攻击。攻击的标准程序通常包括三天的侦察、佯攻和通过平民获取情报。(Headquarters 1952, 15) 进攻计划是根据这些情报制定的。攻击目标则是联合国军防线的薄弱环节，通常是部队间的空隙或南朝鲜陆军部队驻守的防线。(ibid) 志愿军的攻击几乎完全在夜间进行，部队行军也是在夜间进行的，以防受到空中侦察和攻击。(ibid, 16) 尽管计划会根据攻击规模进行调整，但是一场典型的攻击则涉及以下过程。首先，一个突击营穿透敌人的防线；接下来，五个营穿过缺口与联合国后备部队交战，并阻止他们恢复战线；然后，当联合国部队争相守住并恢复防线时，另外两个营将从侧面攻击该段防线。(ibid, 17) 在进攻的同时，小股部队会与沿线其他地方的较大的联合国部队交战，使他们对实际进攻的地点感到困惑，并将原本可以作为增援的部队拖住。(ibid) 后备部队也被用来探知敌人的弱点。整场战斗会在早晨之前结束，以防美国人利用其空中优势进行反攻。

中国的防御战术也同样复杂且有组织。防御工事都建造得很好，可以抵御美国大炮和飞机的攻击。自动武器和重武器被战略性地放置在不同的防御纵深。工事中会有诱饵来迷惑敌人并吸引火力。部队会提前计算武器射程，以确保最有效地利用武器。(ibid, 23) 此外，中国的防御战略非常强调在失去阵地后的反击，这再次体现出建立在对军事科学坚实理解上的复杂战术。敌人预备部队和前线部队之间的侧翼和空隙是通常的攻击目标。反击部队则是由“大规模的班级和排级小队”构成。他们“隐蔽地”移动，“迅速地”攻击，并充分利用包抄、渗透和斜插战术。(ibid, 24) 一本由美国陆军委托编写的，为军官和军士提供战略领导的课程的第一手资料集描述了这些战略的有效性，解释说“中国人会让美国第九军团的部队顺利推进，这样中国的军队就可以在军团友军急于扩大战线尚未建立防御工事时发动攻击。如此一来，前线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崩溃了。”(Gugeler 1954, 154).

对这些攻防战术的重点研究说明中国军队

的作战方法与流行的“人海战术”看法不一致。这也是一些部队和指挥官指出的事实。首先，中国军队会不遗余力地收集情报，制定周密的计划，并使用复杂的战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功的机会，并尽量减少伤亡。此外，与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像流行观点中所说的那样“大规模编队冲锋陷阵以压倒联合国阵地”。相反，志愿军的攻击和反击都是由较小的部队进行的。这些部队通常是分散的，以便其利用地形和夜间的黑暗来接近敌人。(Marshall 1951) 一些了解现实情况的人对广泛认为的中国人海攻击的不准确性感到沮丧。海军陆战队员曾嘲讽地问道：“一个中国排会有多少个成群结队的人呢？”所谓的“人海战术”只不过是志愿军分股作战方法的夸张说法。(Montross and Canzona 2015)。一些行动报告加强了这种认识，解释说：“各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攻击数量很多，而且很集中。然而，集中只是例外。中国人并不像苏联红军对德军那样采用大规模的进攻，即利用人海战术吸收并最终压制了火力。”(ibid) 虽然伤亡可能在一夜的战斗不断累积，但美国的情报和审讯记录证实，中国人的攻击通常是由许多个三人火力小组进行。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互相支援，例如交叉支援或者单独机动。(Headquarters 1952, 1)

此外，攻击和反击的突击队士兵也往往是根据力量、健康、性格和经验精心挑选的，并能得到额外的休息和食物。他们会仔细记住计划，并使用全新的或很少使用的路线，以给予敌军出人意料的打击。(ibid, 20) 这些突击队配备了大量的冲锋枪和可容纳20枚手榴弹的袋子。根据实地研究和囚犯审讯，这种装备配置清理防御阵地的理想选择(Headquarters 151, 39)。美国陆军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军队的成功反击中，志愿军经常用从连到团的突击队来进攻由规模超过一个团的部队所驻守的联合国阵地(ibid, 24)。如此看来，中国人的成功往往来自于科学的战术、计划和强大的机动性，再加上装备精良的突击队，而不是单靠人数。

因此，中国的攻击更符合德国的冲击战术。这种战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人海战术”的替代方案而设计的。³⁵ 此外，这些战术显示了中国军队对军事科学原则的有效理解和执行，例如渗透、细部击溃和弹性防御。这些原则也是美国军事理论的基础。³⁶ 美国陆军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志愿军的军事能力，报告阐释：“志愿军所采用的战术与西方战术非常相似。而联合国部队的空中优势、火力和机动性则是两支部队间的主要差异。”(Headquarters 1951, 128) 此外，报告承认中国的实际战略与大众流行观点之间存在脱节，并指出“敌人的战术是合理的，并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朝鲜和中国军队的战术和部队协调十分优秀，与普遍认为是的“人海战术”完全不同。敌人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相当的计

划性和良好的判断力。”(ibid)

关于伤亡人数差异的解释

尽管志愿军在战术上很熟练，但中美军队在朝鲜的伤亡率却有惊人的差距。(ibid, 129) 加上志愿军几乎完全由步兵组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志愿军使用了“人海战术”。实际上，造成这些不成比例的伤亡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技术的落后，后勤部门难以提供足够的物资，中国军队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落后，以及美国的空中优势。(ibid, 129) 的确，空袭不断地威胁着中国的补给线和部队。尤其是在冬季，当行军路线被限制在公路上，部队在白土地地上就格外显眼。一位美国下士指出，即使在正面战斗之外，美国飞机和大炮也杀死了许多中国军队。他曾在一片土地上发现了六百名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在重新部署时被美国的火箭弹和大炮炸死的。(Peters and Li 2004, 105) 许多其他军事力量，如越共游击队、阿富汗叛军和美国空降部队，也同样是步兵为基础。在面对武装力量较强的对手时均伤亡惨重。然而，尽管这些军事力量都有相同的特点，但志愿军以外的其他部队却不经常被认为是在使用“人海战术”。

误解的原因

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对意识形态、智力和军事优势的信念为是其对中国军事行动产生普遍误解的主要原因。美军和战俘的报告与个人陈述经常将中国军队非人化，将他们描绘成残忍、弱智和缺乏个人能力的军队。一位在1951年被俘的美国上士说道：“战俘营中的一些人几个人要么很软弱，要么没有受过教育就跟着共产党的思路走。”这表明他相信共产党人的智力水平普遍不高。(Peters and Li 2004, 239) 一位陆军军官在他的书中解释说，中国军队的野蛮行为在“世界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地区中是找不到的”。(Rigg 1952) Douglas MacArthur是联合国驻朝鲜所有部队的指挥官。他同样表示中国人没有受过教育。他在日本沮丧地对一位美国作家说：“我不能把我手下这些受过教育和良好培养的男孩们送去对抗那成群的苦力。”(Vining 1952)

少将Dean，朝鲜战争中地位最高的美国战俘，分享了他的观点，即中国人缺乏个人自主性。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的审讯情况。对方问：“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志愿者”要入朝作战？”我说：“因为他们的主人让他们这么做，因为斯大林让他们这么做。”(Dean and Worden 1954) 许多美国军人也有同感。据说他们称中国军队为“穿制服的奴隶”。(Martin 1951) 一位中校同样将中国人描述为“穿制服的机器人”，然后进一步解释说，中国人“被训练得像狗一样。只

要主人指向一个敌人，他们就会恶狠狠地把他撕碎。”(Rigg 1952) 另一位军官记得，当他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体验到我们在美国的自由”时，他对他们感到深深的同情。(Peters and Li 2004, 215) 尽管上尉表示了同情，但一个明显的认知模式已经显现了，即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不自由，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的中国对手没有受过教育，意识形态观点落后低下，并且缺乏个人能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军队和媒体经常不承认，甚至不知道志愿军复杂而有效的军事战术。从逻辑上讲，“中国军队是像动物一样不顾一切地冲向联合国防线以获得胜利”比“中国军队通过复杂的军事战术战胜美国部队”更有意义。(Almond 1953) 在美军发布的事后报告和附加说明的军事报告中，美国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军队优点的不承认是很明显的。这些文本的目的是为军官和军士提供关于战斗的准确描述，以其便从中学习。然而，它们往往没有说明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特点。首先，文本经常描述个人勇气，如一名中国士兵在受重伤后仍继续使用冲锋枪射击，以及美军在多次突袭和双方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未能抓获一名敌方俘虏。(Gugeler 1954, 108; Villahermosa 2009, 184) 然而，这类事件的叙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它们没有承认中国人的勇气，却对美国人的类似牺牲进行赞扬。此外，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一支美军部队在受到三面夹击的情况下崩溃了。(Gugeler 1954, 154) 然而，它并没有赞扬中国部队战胜美国部队所采取的有效战术。

同时，陆军文件将中国军官描述为“傲慢的”。文件描述道：他们走近受伤的美军，并批评志愿军的错误，还说“若中国人真的想，那么特遣部队在回程时根本不会剩下一辆坦克”。(Villahermosa 2009, 222) 军事著作还多次将中国军队称为“共产党员”或“中国共产党员”，将军队附加在意识形态上。同样，这些著作声称，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的美国士兵“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每个人都自助接受了他的那份职责”，也因为“他们以自由人的主动性作出反应。他们知道纪律而非屈服于暴政。”(Gugeler 1954, 164) 这些文件的重点和语言似乎与之前提到的美国自认的意识形态优势相，以及对中国的军事能力的不承认相一致。

种族主义也有可能促成了这些误解的产生。的确，Browne认为，公众对中国人的看法受到了其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一些军官将残暴和狡猾等负面特征赋予了亚洲人。(Browne 1985) 然而，作者在本文研究过程中发现，从原始记录和军队文件的内容看，基于志愿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非人化描述情况远远多于基于种族的观点。此外，194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最常赋予中国人的五个特征是勤劳、诚实、

另外，这种现象可能让美国军队减少了公开表达其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尽管他们的确可能从种族主义的角度看待他们的敌人。因此，有限的公开资料难以对“相比于之前提到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美国人对志愿军部队的看法有多少受到了种族主义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也许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总结

了解美国人对其对手的看法有重大意义。首先，对敌人特点和军事战略的认知，无论是否准确，都会直接影响军队自身的军事决策。例如，对抗“人海战术”的方法与击败其他类型攻击的方法不同。低估敌人的军事灵活性也会导致部队和指挥官的错误信心和缺乏准备。

从被误读的历史实例，例如朝鲜战争，及其根源和后果中学习，可以避免在未来冲突中再次出现的此类错误。

此外，部队的观念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待敌方战斗人员和战俘的方式。根据个人陈述，部队对敌人的非人化可能导致恶劣的待遇和虐待。这在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战俘营中很常见。考虑到有证据表明非人化和虐待仍然是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问题，了解这些看法就显得尤为迫切。美国陆军中尉迈克尔·贝亨纳等服役人员因处决投降的敌方战斗人员而被定罪。最近，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的美国海军士官爱德华·加拉格尔的审判也成为新闻头条。

在未来，对朝鲜战争的研究非常重要。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公众所遗忘，并且老兵逐渐去世，现在能讲述朝鲜战争故事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如果不努力从这场冲突中获取教训，那么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集体记忆会进一步淡化。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美国人的看法。不仅是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军队的看法，而且是对整个中国的看法，及其对战后政策的影响。朝鲜战争的老兵回家后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和经验。这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阐明这种观念在被分享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影响战后美国在面对特定情况时是如何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等，例如在1954年和1958年分别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政府是如何制定决策的。

参考文献

- Almond, E.M. 1953. "What Happened in Korea when the Chinese Marched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34.
- Appleman, Roy Edgar. 1990. *Escaping the Trap: the US Army X Corps in Northeast Korea, 1950*. 1st ed.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Browne, Blaine Terry. 1985. "A Common Thread American Image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1930-1960." *Dissertation*.

- tation,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 Clark, Mark W. 1954.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Harper.
- Cumings, Bruce. 2010.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 Dean, William Frishe, and William L. Worden. 1954. *General Dean's Story*. Viking Press.
- Eighth Army. "After Action Interviews and Reports, November 1950 – September 1951." <https://www.koreanwar.org/html/2018-eighth-army-records.html>.
- Eisenhower, Dwight D. 1961. "Farewell Address." <https://www.c-span.org/video/?15026-1/president-dwight-eisenhower-farewell-address>.
- Fredman, Zach. 2016. "From Allies to Occupiers: Living with the U.S. Military in Wartime China, 1941-1945." Dissertation, OpenBU.
- Gugeler, Russell A. 1954. *Combat Actions in Korea: Infantry, Artillery, Armor*. Combat Forces Press.
- Headquarters, Eighth U.S. Army Korea. 1951. "Enemy Tactics in Korea, Field Study."
- Headquarters, IX Corps, G-2 Section, U.S. Army. 1952 "Enemy Tactics, Techniques and Doctrine."
- Hirschman, Charles, et al. 1995. "Vietnamese Casualties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A New Estimat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no. 4.
- Hughes, Helen MacGill. "Public Opinion, 1935-1946. Hadley Cantri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7, no. 1: 87-88.
- Marshall, Samuel Lyman Atwood. 1951. "Infantry Operations and Weapons Usage in Korea Winter of 1950-5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Martin, Harold H. 1951. "How We Stopped the Biggest Chinese Offensive." *Saturday Evening Post* 224, no. 5 (August): 28–85.
- Mihir, Zaveri. 2019. "Trump Pardons Ex-Army Soldier Convicted of Killing Iraqi Man." *New York Times*, May 6,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06/us/trump-pardon-michael-behenna.html>.
- Montross, Lynn, and Captain Nicholas A. Canzona. 2015. *U.S. Marine Operations in Korea 1950-1953: Volume III - 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Illustrated Edition]*. Normandy Press.
- Peters, Richard A., and Xiaobing Li. 2004. *Voices from the Korean War: Personal Stories of American, Korean, and Chinese Soldiers*.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Phillips, Dave. 2019. "Navy SEAL Chief Accused of War Crimes is Found Not Guilty of Murder."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2/us/navy-seal-trial-verdict.html>.
- Ranger Training Brigade, U.S. Army Infantry School. 2011. "Ranger Handbook."
- Rigg, Robert B. 1952. *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mpany.
- Nordland, Rod, and Mujib Mashal. 2019. "U.S. and Taliban Edge Toward Deal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26/world/asia/afghanistan-taliban-peace-deal.html>.
- Schneck, William. 1998. "Book Review: 'Stormtroop Tactics: Innovation in the German Army, 1914-1918,' by Bruce I. Gudmundsson." *Engineer Professional Bulletin Articles* 28, no. 1.
- Tsai, George Woei. 1985. "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 Analysis of the China, Taiwan,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1949-1983." Dissertation, EconBiz.
- U.S. Army Combined Operations Center. 2016. "Field Manual 90-26 Airborne Operations."
- Villahermosa, Gilberto N. 2009. *Honor and Fidelity: the 65th Infantry in Korea, 1950-1953*.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
- Vining, Elizabeth Gray. 1952. *Windows for the Crown Prince*. Lippincott.

附录：来自作者的备注

我在本篇文章基础上将其拓展成为我毕业论文——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盟国和对手的看法——中的一节。在这个过程中，我增加了文章的证据和论点，并进行了内容的更新，所以本文并不代表我最完整和最新版本的研究；但我对这一研究主题的核心论点和论据基本保持不变。

中国借助区块链技术 对抗COVID-19疫情是否能成功？

黄巍,^[1] 赖华楷,^[2] 刘嘉玥,^[3] 徐诗淳,^[4] 吕思润^[5]

[1]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19级

[2] 东南大学 17级

[3] 列克星敦基督教学院 18级

[4] 北京师范大学 20级

[5] 维斯理学院 20级

摘要：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在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希望利用科学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区块链技术因其在疾病控制和经济恢复的关键阶段中许多潜在应用而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是最早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应对新冠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在这此过程中经验值得研究。中国主要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使用区块链技术：慈善业中的供应链管理、财务数据管理和接触者追踪。虽然中国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使用区块链技术并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两个领域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区块链基础设施。尽管如此，中国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的成功表明了供应链技术有可能在应对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紧急情况中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区块链、新冠疫情、供应链管理、财务数据管理、接触者追踪

在线发布

2022年2月

参考资料

黄巍, 赖华楷, 刘嘉玥, 徐诗淳, 吕思润. 2022. "Was China's Us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Combat the COVID-19 Pandemic Successful?" [中国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对抗COVID-19疫情是否能获得成功?]. IUCJ 2 (Winter), 33-38.

介绍

截至2021年5月，新冠疫情已经在全世界造成319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这场疫情也使世界经济陷入瘫痪。许多企业被迫关闭。一些行业受到的影响十分之大，失业率急剧上升。疫情刚开始，许多政府就试图利用该技术来应对随之而来的健康和经济挑战。区块链技术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技术，也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前途的解决方法。尽管区块链技术因其在加密货币中的应用而最为知名，但它也有其他的广泛用途，其中就包括帮助减轻疫情影响。

在武汉疫情最初爆发的几个月后，中国迅速采用包括区块链的新兴技术来抗疫。中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中国几乎已经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的新增感染人数一直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数据，中国2020年经济总体增长了2.3%（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由于中国是最早采用区块链技术应对疫情的国家之一，在此方面获得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区块链技术

简而言之，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所有的信息都在节点中得到确认和记录。区块链的一个典型例子如图1所示。例如在比特币交易中，当两个节点在进行交易时，一个节点会将交易信息广播给区块链中的所有节点，然后该信息会被所有节点检查和确认。当确认的交易信

息（T1到Tn）达到一定数量时，一个节点会将信息打包，加上时间戳，纳入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即区块链计算机需要解决的函数，以及一系列的随机数，从而形成一个“区块”。单个区块被连接起来，形成“区块链”，其中的数据可以被所有节点即时下载和更新(Zheng et al. 2016)。由于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它必须解决三个问题：（1）如何避免数据被篡改；（2）如何确认信息的来源；（3）如何检查冲突的信息（如多付和重复交易）。现实中，区块链则使用密码学来解决这三个问题。

在一个典型的区块链系统中，仅仅在理论上，数据可以被修改。如果一个节点想修改一条记录，它需要找到记录传播前打包好的区块，并在那里打包，生成一个分支。根据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所有节点只能识别最长的链，所以数据修改者必须使自己的链长于其他所有的链(Zheng et al. 2016)。然而，区块链打包的代价是必须解决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系统会生成一个字符串，其中包括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以及一串随机数字。各个节点需要调整这串随机数，以使哈希运算的结果符合某些要求。如果节点得到了正确的结果，它就可以打包区块，计算的结果将是下一个区块的开端(Zheng et al. 2016)。一个典型的区块链系统中有一个激励系统，即所有节点都可以通过打包获得奖励。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数据修改者想让他自己的链比其他所有的链长，他的计算能力需要大于所有节点的总和。这几乎是不能实现的。

至于如何确认信息的来源，区块链采用了

非对称加密系统。如图2所示，每个节点都有一个私钥。当一个用户注册时，其私钥会产生一个公钥和地址，通过哈希运算向所有其他节点披露。私钥可以加密信息，而公钥可以解密信息。当一个节点发送自己的信息时，它也会发送一个摘要（通过散列信息生成）和一个代码（通过加密摘要生成）。其他节点需要对声明进行散列以获得摘要1，以及用公钥解密代码以获得摘要2。如果这两个摘要是相同的，验证就会成功。如果两个摘要不同，所有其他节点将拒绝该信息(Zheng et al. 2016)。

最后，区块链使用信息追踪来检查冲突的信息。由于现有区块的所有信息都被下载到每个节点，每个打包的人都可以看到是否有冲突的信息(Zheng et al. 2016)。

文献综述

关于区块链技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潜在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供应链管理，数据管理和人口流动管理。

对于供应链管理，一些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区块链和机器学习来设计和开发疫苗供应和监督系统(Yong et al. 2020)。与此同时，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证明区块链可以减少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进而促进公众众筹医疗用品(Khurshid 2020)。

在数据管理方面，有人指出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处理医疗保险索赔以及贷款中发挥作用。这一技术能减少大量文书工作(Khurshid 2020)。此外，事实表明，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地确保病人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Wang, Liu, and Cao. 2020)。

至于人口流动管理，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结合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系统，促进人们的自我检测(Thompson and Crayton 2020)；而其他人士则建议使用基于区块链的系统来检测和防止人群聚集(Garg, Bansal, and Padappayil 2020)。另一项关注国际旅行的研究也建议政府采用区块链来管理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Bansal, Garg, and Padappayil 2020)。

此外，更具体的研究触及了区块链在中国应对疫情的现有应用，其中一些例子是使用该技术来跟踪捐款，帮助小企业申请贷款，以及方便出行。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虽然目前有大量文献预测区块链未来趋势及其目前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但这些文献均未对该技术使用是否成功进行深入分析。即使该技术已经高度发达，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仍会面临许多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推广该技术之前应该对其既有应用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对于长期预防和控制新冠疫情和其他传染病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

们将重点讨论区块链在中国新冠疫情中的应用，并考察该技术是否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对于没有达到最佳效果的应用，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潜在问题和未来前景。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慈善业的供应链管理

传统制度的问题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飞速进步，中国的供应链管理也在蓬勃发展。然而新冠疫情严重损害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既有供应链管理体系。疫情导致了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用品严重短缺。传统的应急物资供应链管理依赖于一个由中心分配和分发医疗用品。虽然这样的系统在几十年来一直充分发挥作用，但在新冠疫情中，其效率低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个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慈善机构往往很难获得实质性的支持。近年来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接连被曝出丑闻，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很低(Pan 2020)。为了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慈善机构需要重新建立他们的信誉。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捐赠信息的透明度。

捐赠信息的透明度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存在有几个原因。首先，工作人员可以在捐款上做手脚而不被追究责任。其次，即使没有篡改款项记录，追踪捐赠去向也很困难。要做到这一点，组织需要积极收集捐赠者、受益人和物流中心的信息。这将不可避免导致更高的人力和运营成本(Ren 2021)。基于此，在传统的捐赠追踪中捐赠者往往只知道他们的钱会流向哪个项目，却不知道谁是实际受援者，受援者收到了多少捐赠，或者他们收到捐赠的时间。换句话说，信息不对称使得捐赠者在考虑是否捐赠时更加犹豫不决。

区块链作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

区块链因其特性被许多人提出来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一，区块链收集信息的方式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可以保证信息的可信度。改变已经上传到数据库的信息非常困难，并且每个能进入数据库的人都能验证信息。自动验证过程可以确保信息是由正确的用户（即捐赠者、接受者、物流中心等）发送的。相互验证过程可以确保每个用户发送的信息是可信的(Guo 2018)。

此外，区块链能够使用智能合约来提高跟踪效率。上传到数据库的信息可以由智能合约进行处理。智能合约是定义和执行双方协议条款的代码集(Lipton and Levi 2018)。当捐赠物资到达

物流中心时, 相关信息可以上传到数据库, 之后一组代码会验证信息, 记录捐赠的流程, 并将信息发送给相关用户 (Guo 2018)。智能合约还可以处理人们的需求信息, 根据紧急程度有效分配物资 (Lei 2020)。

在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的融资方面, 虽然开发该系统可能需要相当大的初始投资, 但从长远来看基于代码的跟踪系统可以大大减少劳动力和操作, 从而尽量减少后续纠纷。

以罗营山联为例的研究

罗营山联是武汉大学在疫情期间创建的一个电子平台。其目标是将医疗用品捐赠与医院需求进行智能匹配。该平台基于区块链技术, 能跟踪捐赠的医疗用品的流动。人们期待区块链的使用可以使捐赠信息更加透明, 进而促进人们进行捐赠。在该平台上, 全国各地的医院可以直接列出他们的需求。捐赠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完成, 没有繁琐的程序。鉴于有关捐赠的信息往往是琐碎而复杂的, 使用智能合约似乎可以大大增加效率 (Tuoluocaijing, 2020)。

虽然该平台理论上可能非常成功, 但数据表明并非如此。该平台在2020年2月26日停止运营。在运营的两个多月里, 虽然其能够完成对133家医院的捐赠, 但医院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捐赠者的供应。925家医院在平台上列出了他们的需求, 但只有56人通过平台进行捐赠 (Luoying Shanlian 2020)。

这个平台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原因之一是, 它无法在信息透明度和效率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这是大多数类似平台面临的问题。区块链依赖其去中心化的特性来解决公众信任缺失这一问题。然而, 在应用中, 大多数基于区块链的捐赠平台, 包括罗英山联, 使用的是仅仅是部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 也就是说, 只有少数获得授权的机构可以直接上传并访问数据。公众只能在二级平台上访问这些数据 (Luoying Shanlian 2020)。这种情况导致数据仍然可以被篡改, 而公众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虽然平台可以选择使用公有链, 但其代价是牺牲效率。若使用公有链, 则每当数据被上传到一个节点, 就会有一个验证和同步的过程。这将减慢整个过程。尽管延迟不会很大, 但这将与满足医院紧急需求的目标背道而驰 (Finance Sina 2020)。此外, 对于医院来说, 将区块链整合到他们原有的系统中需要额外的成本和努力, 这也可能拖慢进程。

正如罗英山联的案例研究所说明的那样, 由于某些限制, 区块链在中国的慈善业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还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如此, 这些限制大多是由区块链有关的技术挑战导致的。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更广泛的采用, 在信息透

明度和效率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可能会变得更容易。

财务数据管理

财务数据管理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中国大多数非基础性企业被迫停业, 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2020年2月初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之前抽样的2349家中小企业中, 14%的企业的现金流无法持续超过一个月。雇佣农民工和被大规模取消掉的贸易展览会导致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遭受的损失更大 (Zhang 2020)。这些出口型中小企业的永久关闭将大大削弱中国的GDP和经济增长势头。

区块链作为解决方案

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 中国利用区块链来提高贷款处理的效率。例如, 在2019年3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SAFE) 推出了一个跨境试点区块链平台 (2019年6月)。该区块链系统的设计旨在通过解决与传统贸易融资模式的问题, 如缓慢的核查过程和缺乏信息透明度, 来促进跨境商业活动 (Cheng 2020)。在新系统下, 在传统模式中需要几周的流程可以被缩短到一天, 并且外国企业进行贸易的企业可以在贷款申请过程中创建永久且容易访问的关键文件夹。此后银行可以将这些文件作为信用基础来确定贷款规模 (Cheng 2020)。该平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武汉爆发疫情后立即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说, 仅在2020年1月, 就有87家中国企业通过该平台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贷款。

对中国的区块链试点的案例研究

尽管区块链平台最初并不是为了应对疫情, 但在疫情的冲击下, 它仍然很快成为促使经济复苏的工具。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在2020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扩大该平台的计划。数据显示, 这些计划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在直接影响之外, 基于区块链的平台还能够为财务数据管理领域的区块链发展创造一个积极的自我强化循环。缺乏公众意识是中国区块链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从该平台最初推出后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便可辨明一二。然而在疫情爆发后, 该平台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的有效性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曝光率的提高吸引了一些金融机构在2020年初加入 (Cheng 2020), 并且提高了公众的意识, 也会促进区块链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的更多应用。考虑区块链系统的长期影响是很重要的。国际需求的恢复速度不如国内需求, 因此, 与同行相比, 需要经常进行跨

境交易的企业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受到疫情影响。

然而，人们对区块链在财务数据管理的应用仍有担忧。人们担忧其管理是否会促成不良贷款的积累和僵尸化，即对将淘汰的和在经济几乎没有贡献的企业的持续支持。目前，区块链的系统鼓励企业借贷可能导致几个问题。其一，由于经济完全恢复的时间尚不明了，企业很可能会拖欠贷款。在2020年，中国小企业的未偿不良贷款已经大幅增加 (Trivedi 2021)。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摩擦，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十分艰难了 (Trivedi 2021)。这意味着它们的倒闭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现在它们却靠贷款生存，这会导致生产力下降。总的来说，该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使用区块链能够在短期内帮助中小企业保持开放，并长期促进经济发展。这两者都有助于经济复苏。即使不良贷款的积累令人担忧，但这主要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区块链技术导致的。区块链只是让企业更愿意也更容易借贷。

接触者追踪

传统接触者追踪方法的问题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用最多的接触者追踪方法是二维码。早在2020年2月，杭州的一家科技公司VastChain就推出了健康码程序“出入通”。居民可以通过该程序获取二维码，显示他们是否接触过感染者 (Mozur, Zhong, and Krolik 2020)。后来，各省开始相互签署认证和合作协议帮助人们在出行时使用当地的健康码 (Zhang 2021)。使用二维码来追踪接触者的做法非常有效。然而在疫情的初期，人们对数据隐私和安全有一些担忧，也因此许多研究人员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替代解决方案。

区块链作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

理论上，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或平台可以是一个更安全的替代解决方案。然而疫情期间中国大陆没有开发这样的应用程序或平台。这说明基于区块链的接触者追踪方法可能不适用于大陆。

区块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更安全地存储和处理数据。这是基于其去中心化的基本原理，将数据的开发、运行和利用过程分开。然而，如果大陆要实施区块链接触者追踪系统，就必须由政府以集中的方式来领导。目前，中国以政府为基础架构运营区块链平台，以分布式节点的形式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 (Haldane 2021)，而这不能解决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更广泛地说，区块链的不可更改性也会成

为接触者追踪的负担。区块链的不可更改性是指区块链账本保持不变的特点。这一特性可以保护区块链系统免受网络攻击 (Hasan et al. 2021)。虽然防止网络攻击很重要，但许多人认为在追踪接触者这一用途中，更重要的是确保人们的信息被准确记录。区块链的不可更改性会让更正错误的测试结果更困难。

对跨境接触者追踪的案例研究

尽管在疫情期间中国大陆没有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或平台，但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健康码程序在2020年5月被推出。其用途为电子通行证，方便游客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之间的旅行。这个健康码利用了中国的开源区块链平台FISCO、BCOS和Weldntity。这个平台有助于存储用户信息。只要旅客在7天内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就可以在100秒内申请并获得健康码 (Nanfang Daily)。

这个例子说明，与追踪国内接触者相比，区块链在追踪跨境接触者时可能会更有效。与使用区块链在各省之间存储和传递接触者和旅行信息不同，在跨境背景下使用区块链更简单。在跨境背景下，只有一个结果是重要的，即一个人是否符合规定。区块链在追踪跨境接触者中的一个优势是其去中心化。在传统的接触者追踪方法中，信息若要在多国政府之间传递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监督的中央机构，这是非常难实现的。相反，各国各地区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基本原理让协调多边关系更加方便 (Idrees, Nowostawski, and Jameel 2021)。

讨论

潜在的改进

理论上，区块链可以促进慈善事业的更好运作。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其计算能力的限制，该技术目前无法在效率和透明度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和后勤部门很难适应和管理任何基于区块链的平台。

第一个可实现的改进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改进方式，是提高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这将解决效率和系统透明度之间的权衡问题。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主要取决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政策。

第二种更可行的改进方法是政府为慈善机构提供国家补助金，用于抵消采用基于区块链平台所增加的管理成本。这不仅可以在短期内维持基于区块链的慈善平台的健康运行，还可能鼓励更多的慈善机构加入到创新的行列中来，从而促进区块链在供应链管理中的长期发展。

人们可能认为，仅仅为了支持基于区块链

的慈善平台而增加财政支出并不值得。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区块链的应用是跨行业的。换句话说，基于区块链的慈善供应链管理方法可以迁移到其他领域。

此外，虽然由于与政治制度的冲突，区块链的接触者追踪系统不太适合在大陆使用，但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谈判与周边国家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像澳门和广州之间使用的统一接触者追踪系统。

全球影响

澳门和广州的例子表明，区块链可以有效应用于接触者追踪。随着疫情的逐渐正常化，世界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接触者追踪系统以减少疫情对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有可能从澳门和广州的系统中得到启发，在人口或贸易流量大的地方建立小型区块链系统。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区块链应用的低效率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警示。比如，中国已经表明，区块链在慈善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前景远非理想，其他国家，尤其是医疗和技术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在将区块链技术投入慈善事业时应谨慎行事，提前考虑许多问题。例如，如果平台失败，已有捐款如何处理。

结论

在新冠疫情期间，区块链技术作为帮助疾病控制和经济恢复工作的潜在工具被广泛讨论。这带来了许多新应用的发展。在中国，这些发展主要可以分为慈善业供应链管理，财务数据管理和接触者追踪等类别。在慈善业供应链管理方面，区块链技术在理论上可以帮助捐款追踪以及减少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平台很难在确保效率和保持所有信息透明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财务数据管理方面，区块链技术的目标是加快贷款处理过程中的验证程序。从实践中看，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在接触者追踪方面，虽然区块链技术在境内接触者追踪方面没有被成功地应用，但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技术可能对跨境接触者追踪有巨大作用。

虽然区块链技术很多时候未能实现其理想效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能实现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缺乏区块链基础设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技术进步仍然缓慢，因此很难将区块链融入现有系统。因此，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很难接触到公众（例如，吸引全国范围内的捐助者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接触者追踪）。另一方面，当普及率不再是一个问题时（例如，吸引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或实现特定边界的接触者追踪），区块链的

应用效果很好。国内区块链基础设施的缺乏并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但随着近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它在公共卫生应急解决方案上的应用发展前景依然乐观。

参考文献

- Bansal, Agam, Chandan Garg, and Rana P. Padappayil. 2020. "Opt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VID-19 'Immunity Certificates' Using Blockchain."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44, no. 9. doi:10.1007/s10916-020-01616-4.
- "Can Blockchain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Public Trust?" *Finance Sina*, October 13, 2020. https://finance.sina.com.cn/blockchain/coin/2020-10-13/doc-iivhvpwz1361810.shtml?cre=tianyi&mod=pcpacer_fin&loc=8&r=9&func=100&tj=none&tr=9.
- Cheng, Evelyn. 2021. "China Taps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Boost Financing for Businesses Hit by Virus." *CNBC*, February 15,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2/15/coronavirus-china-taps-blockchain-tech-to-help-firms-hit-by-virus.html>.
- Chirag, Bhardwaj. 2021. "12 Tell-Tale Signs of Blockchain Adoption Amidst COVID-19." *Appinventiv*, July 28, 2021. <https://appinventiv.com/blog/blockchain-adoption-amidst-coronavirus/>.
- Feng, Coco. 2020. "How Blockchain Allowed 17m People to Travel Between Guangdong, Macau Amid Coronavirus Pandem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2, 2020. <https://www.scmp.com/tech/blockchain/article/3106636/blockchain-allowed-17-million-people-travel-between-guangdong-macau>.
- Garg, Chandan, Agam Bansal, and Rana P. Padappayil. 2020. "COVID-19: Prolonged Social Distanc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Using Blockchain-Based Movement Passes."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44, no. 9. doi:10.1007/s10916-020-01628-0.
- Guo, Yinghong. 2018. "Blockchain-based charitable donation method, system, and storage medium." *China*. Patent number G06Q 20/36 2012.1, Filed October 16, 2018, Issued February 1, 2018.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detail.jsf?docId=WO2020000784>
- Haldane, Matt. 2021. "What Blockchain is, How it Works and How China will Lead the Wor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7, 2021. <https://www.scmp.com/tech/blockchain/article/3117745/what-blockchain-how-it-works-and-how-china-will-lead-world>.
- Hasan, Haya R., Khaled Salah, Raja Jayaraman, Ibrar Yaqoob, Mohammed Omar, and Samer Ellahham. 2021.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using Blockchain." *TechRxiv*, April 21, 2021. doi:10.36227/techrxiv.14052320.
- Idrees, Sheikh M., Mariusz Nowostawski, and Roshan Jameel. 2021. "Blockchain-Based Digital Contact Tracing Apps for COVID-19 Pandemic Management: Issues, Challenges, Solu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MIR Medical Informatics*, February 9, 2021. <https://medinform.jmir.org/2021/2/e25245>.
- Jun, Liang. 2019. "SAFE Expands Pilot Blockchain Platform." *Global Times*, November 11, 2019. <https://en.people.cn/n3/2019/1112/c90000-9631407.html>.
- Khurshid, Anjum. 2020. "App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 to Address the Crisis of Trus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MIR Medical Informatics* 8, no. 9. doi:10.2196/20477.
- Lipton, Alex B., and Stuart D. Levi. 2018. “An Introduction to Smart Contracts and Their Potential and Inherent Limitations.” *The Harvard Law School For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May 26, 2018.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8/05/26/an-introduction-to-smart-contracts-and-their-potential-and-inherent-limitations/>.
- Luoying Shanlian. 2020. <http://charity.foodblockchain.com.cn/>.
- Mozur, Paul, Raymond Zhong, and Aaron Krolik. 2020. “In Coronavirus Fight, China Gives Citizens a Color Code, With Red Flag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1/business/china-coronavirus-surveillance.html>.
- “Nationa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rotec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Luoying Shanlian.” *Tuoluo Caijing*, April 22, 2020. <https://www.tuoluo.cn/article/detail-10001377.html>.
- “National Economy Recovered Steadily in 2020 with Main Goals Accomplished Better Than Expect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January 18, 2021.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2101/t20210118_1812432.html.
- Pan, David. 2020. “China’s Coronavirus Outbreak Prompts Charity Blockchain Use.” *CoinDesk*,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coindesk.com/china-coronavirus-charity-blockchain>.
- Ren, Chaoran. 2021.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onthly*, 135-140.
- “Southern Guangdong and Macao health code-Behin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Nanfeng Daily*,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275211.html.
- Thompson, Mashamba, and Ellen D. Crayton. 2020.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19 Self-Testing.” *Diagnostics* 10, no. 4: 198. doi:10.3390/diagnostics10040198.
- Trivedi, Anjani. 2021. “China’s Bad Loan Season Descends Again and This Time It May Be Really Bad.” *Bloomberg*, February 16,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2-16/even-with-recovery-china-s-bad-loan-season-may-be-really-bad-this-time>.
- Wang, Hui, Yuxiang Liu, and Shunxiang Cao. 2020. “Medical data storage mechanism integrat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 47: 285-91.
-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covid19.who.int/>.
- Yong, Binbin, Jun Shen, Xin Liu, Fucun Li, Huaming Chen, and Qingguo Zhou. 2020. “An intelligent blockchain-based system for safe vaccine supply and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2. doi:10.1016/j.ijinfomgt.2019.10.009.
- Zhang, Laney. 2021. “China: Digital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for Citizens Traveling Overseas Launched.” *Library of Congress*, March 18, 2021. <https://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china-digital-vaccination-certificate-for-citizens-traveling-overseas-launched/>.
- Zhang, Xiaobo. 2020. “COVID-19’s Impact on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17, 2020. <https://www.ifpri.org/blog/covid-19s-impact-chinas-small-and-medium-sized-businesses>.
- Zheng, Lei. 2020. “How Blockchain Can Solve the Credit Problem in Charity.” *Sohu*, February 12, 2020. https://www.sohu.com/a/372373508_100217347/.
- Zheng, Zibin, Shaoan Xie, Hong Ning Dai, Xiangping Chen, and Huaimin Wang. 2018. “Blockchai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b and Grid Services* 14 (4): 352. <https://doi.org/10.1504/ijwgs.2018.095647>.

第二卷 | 2022 冬



对了...

你找到大象了吗?

中美校际期刊

IUCJ